

中日关系 2023：再确认与再出发^①

胡令远 殷志军

内容提要 2023年，人们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前一年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旨在后疫情时期恢复各种交流的曼谷五点共识，次第得到落实。但俄乌战争长期化、激烈化，进一步加剧了阵营对抗的深刻化。此外，经济安保的推行也给新冠疫情后包括中日经贸在内的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蒙上了阴影。2023年的中日关系，虽依然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但总体上相对稳定，在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则表现出很强的“韧性”。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两国领导人实现旧金山会晤，再次确认坚守条约精神，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注入新内涵。这给百年变局下直面种种困难的中日关系的再出发，指明了前行方向。如何将两国领导人高屋建瓴的共识，进一步化为具体政策，付诸行动，共同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两国的使命所在。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印太战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作者简介：胡令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殷志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中日关系总体上相对平稳，主要有以下影响因素所致。

首先，负面要素存量即三年疫情中积累的负面因素，伴随着新冠疫情阴霾逐渐消散、各种交流次第恢复展开而得以有所稀释与缓解。特别是2022年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曼谷共识”，借助2023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在两国高层、经贸、人文等领域逐步落实。

其次，突发事件、重大事件冲击力的递减效应。前者主要包括2022年2月突然爆发的俄乌战争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冲击，特别是美日等借机把俄乌战争与台海问题相提并论的炒作。此外，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及与此相关的所谓中国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日方提出所谓强烈抗议事件的影响。最后，2022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推出“安保三文书”，将中国定位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国家”，由此决定今后5年军费翻倍、研制和引进战略性进攻武器等。

^① 本文摘自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之十)”总论部分，报告书原文可参见，<https://iis.fudan.edu.cn/23/94/c6840a664468/page.html>

一、中日关系整体上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

虽然 2023 年中日关系总体相对平稳,但两国关系依然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结构性矛盾的存量与增量相叠加,战略性疑虑不断加深。中日之间的领土及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旧有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与此同时,伴随着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迅速拉大,日本在国家安全的认知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加大和深化。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作为中国近邻的“岛国”日本在“涉海”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性,如前述与 2022 年佩洛西窜访台湾相关的所谓中国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事件、“安保三文书”的出台等,都与此密切相关。它们的冲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有所减弱,但其内含的核心诉求却不断沉淀下来,显现出冷战后特别是中日 GDP 逆转之后,这十余年来逐渐生成的中日间“海洋安全困境”这一新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且与旧有结构性矛盾相关联、相叠加的特征。中日之间的“海洋安全困境”,既与岛国的自然禀赋对海洋交通要道的特殊诉求相关,也内嵌有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逻辑。

其二,日本版“印太战略”多重结构的打造与深化。2023 年,日本继续推展和加大针对中国的日本版“印太战略”的举措和力度,并有新的突破。如日本配合美国,特别是与韩国尹锡悦政府积极互动,通过首脑穿梭外交,营造“日韩和解”氛围。在此基础上,8 月 18 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聚首戴维营,这一在多边会议以外首次单独举行的三方峰会,意在美日、美韩“双同盟”的基础上,实现美日韩三国同盟关系的“一体化”,打造针对中国的东亚“小北约”。因此人们看到,在峰会形成的文件中三国宣称:“关于我们最近看到的中国在南海支持非法海洋主张的危险和挑衅行为,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水域现状的企图。”同时,在台海问题上三国强调“我们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云云,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这是美日韩三国首次以峰会文件方式针对中国正式共同发声,无疑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战略性重大负面影响。

不仅在以上传统安全领域,在所谓的经济安保方面,日本也积极协力美国,推展“印太经济框架(IPEF)”,打造制约中国的“小院高墙”。如 2023 年 7 月 23 日,日本政府出台并实施限制对外出口 23 种半导体制造材料和设备,并对相关环节和技术问题进行管制。这些品类的材料和设备的出口,除了“友好”国家和地区外,须获得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的单独许可,而申请单独许可所需手续极为繁杂,从而在相关产品出口领域建起了高墙。虽然新规并未指名道姓,但毫无疑问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中国。

长期以来,中国是日本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的主要出口对象国。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却仍然一意孤行采取损人不利己的举措,其目的在于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其中所显现的日本在经贸领域的对华战略判断和政策走向令人担忧。这种把贸易和科技问

题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和举措,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具有政治和经济相叠加的双重性质。

其三,提升与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枢纽地区”——东南亚关键国家的关系。2023年,包括岸田文雄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频繁出访被日本视作“印太战略”“枢纽地区”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以其中在南海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为重点拉拢对象。继日本外相上川阳子10月访问越南等东南亚四国之后,11月岸田首相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确认了双方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并就启动使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RAA)的缔约谈判达成一致。同时,日本决定根据2023年4月设立的旨在向他国提供防卫装备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框架,向菲律宾提供价值6亿日元的海岸监视雷达。12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在东京举行,在日本的推动下,峰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所谓“加强海洋安保合作”。为将东盟打造为推行日本版“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本次峰会上,日本又宣布向马来西亚提供预警和监视设备,向印尼提供日本制造的大型海上巡逻艇等。此外,2023年10月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访问日本,双方就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同时确认将在安保领域扩大合作,还就日本把越南列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支援对象展开讨论,一致同意基于《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推进日本向越南出口装备品。这些都是基于岸田首相所强调的“越南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关键伙伴”的基本定位所采取的相应举措。

其四,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挑战中国底线。2023年8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访问台湾,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访台的日本最高级别政治人物。这一行径,代表了日本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日关系红线的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值得高度警惕!

二、中日关系定位的再确认与再出发

如前所述,尽管2023年的中日关系相较去年相对平稳,但依然矛盾重重。特别是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中强烈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日本政府强调最终排放的是“处理水”),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新的困难。数量庞大、构成复杂的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是重大的核安全问题,具有跨国界影响,并非日本一国之私事。日本在没有事先同中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做出将核事故污染水处理后排海的决定并强行付诸实施,其举措在程序上是不正当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报告不能也没有给予日本政府排海决策以程序上的正当性。中国对这一严重贻害人类生存环境的不负责任行为予以谴责,并决定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正义、合理之举,日本却咬定全世界只有中国采取这种态度和反制手段,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并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

实际上,福岛核事故污染水的处置,本来有可能成为通过国际善意沟通、协商甚至协作,作为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重大事故所造成跨国影响、具有启发意义的良好范例,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的举措,不仅封闭了上述可能,而且开启了一个相反的先例,并给中日关系发

展造成了新的障碍。

然而,因为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面对严峻局面,也必须不断探索如何走出困境,面向未来之路。

首先,继 2022 年两国首脑曼谷会晤之后,2023 年 11 月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再次确认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赋予新内涵。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中日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双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岸田文雄首相则做出“希望着眼未来,增加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坚持和平共处”等积极回应。2022 年曼谷首脑外交形成的五点共识,对于稳定新冠疫情后的中日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次的“旧金山之约”,显示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两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5 周年的重要节点,重温初心,再次确认两国关系的“定位”;同时面向未来,赋予其新的内涵。不言而喻,这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视角把握中日关系大局和取向之举,意义重大。以此为指针,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并积极评价刚成立的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同意保持各层级对话沟通,适时举办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等,为中日关系的止损与进一步推展指明了方向。

以这些共识为背景,11 月 26 日,时隔长达 4 年的中日韩三国第十次外长会议在韩国举行。王毅外长表示,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日韩应以更进取姿态,推动三国合作重回正轨,保持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韩、日外相朴振、上川阳子表示三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加强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是必由之路。为三国领导人会议做好各种准备,也是这次外长会的重要议题和目标。这使人们对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经济合作的扩大,给予很大的期待。

2023 年的中日经贸合作,虽然受到“经济安保”的影响,但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势头。2023 的前 10 个月,中日贸易额为 2564.18 亿美元,与往年持平。在 2023 年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有多达 300 多家的日本企业积极参展,居外企首位。

三、愿景与展望

2023 年的中日关系虽然整体相对平稳,但国民感情依然在低位徘徊,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降至新低,负面观感却高达 90%以上。中美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美国对华制衡总体战略并未改变。而在日本国内政治不断右倾保守化的背景下,希望日本很快改变偏执的中国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对华战略方向,难切实际。当务之急是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各领域各层级对话交流,确认中日关系中的“底线”和“护栏”,增强务实合作,确保中日关系的大局基本稳定。

具体而言,第一,要深刻认识在百年变局下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稳定的重要意义,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在进一步加强首脑外交的基础上,夯实政府实务部

门，尤其是经贸、环保、康养、教育、观光等部门之间的交流。为此，可以建立或者进一步完善若干部际会晤机制。另外，要鼓励在中日两国民间经济团体，如中国民营企业家组织、行业商会与日本经团联等之间建立务实性、机制化交流平台，在双方都感兴趣的、安全敏感度较低的领域设置若干大型合作项目，以推动两国的合作，防止高敏感度领域相关措施的强化和泛化，波及和损害两国在低敏感度领域的往来与合作。

第二，越是在困难的局面下，越是要克服各种障碍，进一步落实和推进两国在安保领域、特别是涉海部门之间的机制化交流，防止误判。

第三，就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两国组成专项小组，通过不断磋商交流，逐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其中包括海产品问题。

第四，采取有效举措加强人文交流。尽快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方便双方人员往来。同时探讨增设面向对方国家青年学生和青年研究者的专项基金，以鼓励年轻人通过学习和研究、深入了解对方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先行一步，通过官民合力的方式，设立面向日本青年学生和青年研究者的专项基金，大幅度增加资助名额和力度，鼓励更多的日本年轻学子来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支持更多的日本青年学者研究中国。

第五，为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的、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双方特别是高端智库应加强合作，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这是一项长期性和战略性要务。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东京大学教授

我也同意中日关系处于战略被动状态的说法。总体来看，除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外，新冠肺炎和乌克兰战争后国际局势的紧张，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年代末以来，中美之间在安全、价值和技术方面的竞争更加明显，全球对华情绪在新冠肺炎流行的过程中恶化。此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加剧了将中俄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也与这一不断变化的局势有关，即担忧像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那样，在东亚也可能发生“武力改变现状”的事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日本参与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中止了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俄罗斯军队在日本国内和周边地区变得更加活跃。有时，俄罗斯和中国在日本周边的联合军事行动加剧了日本的危机感。2022年底的三份安保文件、以及日本政治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都与这些局势变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除了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治也将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岸田政府在支持率较低的情况下苟延残喘。由于超过85%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加上自民党保守派成员的执政，岸田首相本人也力图避免被视为“亲华派”，以至于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首脑会谈时，他公布了会谈内容，并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宣布不会在年底前举行选举。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诸多国内问题，可能无法做出重大政策

调整,同时又要避免外交上的风险。

2023 年中日关系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旧金山首脑会谈重申“战略互惠”关系。中日两国确立“战略互惠”关系是在 2006 年,现在被确认仍然继续,因此有必要找到适合 2020 年代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内容。然而,自日中首脑会谈以来,部长级会议并未取得实质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是中日关系发展没有“动力”。这可能不仅是由于上述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由于经济关系的淡化。日本在中国的新投资急剧下降,日本人在中国被扣押对日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福岛食品问题固然重要,但中方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日本人被拘留对中日经济关系和中日文化关系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

2024 年是选举年,尤其是 11 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其结果很可能改变国际格局。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日中两国都必须坚持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决不能打开战争之门。

二、青山瑠妙 早稻田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每年对中日关系进行定点观测,在捕捉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连续性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中日交流重启的这一关键时期,这种对中日关系进行全方位客观分析的学术活动意义重大。

2024 年版依然凝聚了诸多珠玉之论,是一份高质量的报告书。整体而言,相较于往年的报告书,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2023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5 周年的重要节点,本报告书对 2023 年中日关系的看法是“总体向好”。在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问题的极大冲击下,虽然存在诸多“不安定因素”,但整体相对平稳。所以本报告书中用“再确认”与“再出发”来评价 2023 年中日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客观,且印象深刻。

第二,与往年报告书不同,新增的“全球南方”、“广岛 AI 进程”专题是另一个特点。

一直以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紧跟时代脚步不断更新分析视角,这一定位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报告书的品牌价值。

总论概括性地评价了 2023 年的中日关系。总论指出,2023 年进入后疫情时期,两国高层、经济贸易、民间交流等领域开始恢复,与 2022 年相比,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总体较少。另外,总论对 2022 年 11 月在曼谷举行的新冠疫情以来的中日首次首脑会谈、2023 年 11 月在旧金山 APEC 会议时举行的中日首脑会谈给予高度评价,强调了“五点曼谷共识”以及重新确认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总论中依然将中日关系定义为“战略性消极状态”。除了受到国际关系结构性的制约外,日方当前在以下四个方面试图牵制中国:一、中日战略性疑虑不断加大;二、日本版的多重结构“印太战略”的推进;三、与东南亚诸国,特别是与在日本版“印太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加强了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四、在台湾问题上日方的立场。

如前所述,总论从宏观的角度概括分析了日方动向,对 2023 年中日关系的看法较为悲观。

总论中提到中日两国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日两国积累的重重矛盾难以缓解,但是两国关系仍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这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吗?

1990 年代中期以后的中日关系常常被称为“政经分离”,2023 年的中日关系也并没有偏离这一点。中日间的经贸相互依存关系依然牢固,民间交流也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日关系的韧性很强。在强调经济安全保障的国际趋势下,并非必然会对经济贸易和民间交流造成很大损害。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转折点。总论中提出继续保持高水平经贸合作、扩大民间交流的提案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加强经济安全保障是当今国际关系趋势的一部分,而且不容易改变,所以如何在深化经济安全保障的同时,消除阻碍经济关系、民间交流的负面因素,有待双方制定出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具体政策,我认为这也是中日关系“再出发”的原点。

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

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胡啸宇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通过分析历史背景，本文揭示了日本与台湾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及其对当前政治态势的影响。文章详细阐述了反“台独”运动在日本的起源、主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并评估了运动在政治、社会、文化及国际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本文还介绍了运动的实施策略，包括组织动员、公共外交与宣传策略、以及跨组织合作。最后，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策略建议，旨在通过政策改革、公共外交和国际合作来支持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为其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更加有效的路径提供指导。研究表明，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合理的策略和有效的对策能够帮助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找到更加有效的路径，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 日本 反“台独” 促统一运动 国际合作 公共外交

作者简介：胡啸宇，中国共产党佛山市委员会党校讲师

基金项目：2024—2025 年度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研究成果（编号 2024—GDSYKT—36）

引言

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一直备受瞩目。该运动旨在反对“台湾独立”，促进两岸统一，主要通过社会动员、公共外交和跨组织合作等方式进行。然而，该运动在日本国内外面临来自政治、社会、文化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影响了运动的实际效果，也使得其在推动政策变化和争取公众支持方面面临困境。

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自 1895 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开始，两地关系便交织在复杂的历史脉络中。尽管二战结束后日本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但两地在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方面依然保持紧密联系。此外，随着 21 世纪日台合作的深化，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信息化及灾害应对等领域，日台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层次化。

学界研究表明，在日本政治和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复杂的情绪和战略。历史上，日本右翼

力量一直支持“台独”，并作为阻挠中国统一的一种策略。^①然而，近年来，日本的政策及其国际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受到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影响，日本对台湾的态度出现了某些策略性调整。^②日本的一些政治团体，尤其是被称为“台湾帮”的团体，积极推动反对中国的政策，支持“台独”。^③总的来说，这一特定领域的研究相对稀少，但从现有文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所面临的挑战涉及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将详细探讨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背景、面临的挑战及其实施策略与对策建议。首先，文章将回顾日本与台湾的历史关系，并分析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情况。接着，文章将评估该运动在政治、社会、文化及国际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随后，文章将介绍运动的具体实施策略，包括组织动员、公共外交和跨组织合作等方面的活动。最后，文章将提出相关对策与策略建议，以期为该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

在探讨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当前政治态势的影响时，需回溯至 1895 年，即日本首次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开始，直至 1945 年二战结束。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对两地的文化和政治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战前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战后的《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标志着日本正式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④但两地在经济与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并未因此中断。

1972 年，随着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日本政府采纳了“一个中国”政策，这使得日台官方关系转为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层面。^⑤尽管如此，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并未中断，反而在经济、文化及人民往来等方面持续发展。

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与台湾在多个层面上的合作持续加强，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信息化及灾害应对等领域。例如，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GCTF)是一个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由台湾、美国和日本共同参与，^⑥这反映了日台试图突破非正式的双边关系，强化在多边框架下非传

^① 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运动》，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第 44–51 页。

^② Sheila A.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aiwan.” Asia Policy, vol.17, no.2, 2022, pp.69–97.

^③ 林晓光：《战后日本的“台湾帮”日台关系》，载《台湾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46–50 页。

^④ 日本外务省「歴史問題 Q&A 関連資料 日本の具体的戦後処理(賠償・財産・請求権問題)」，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22_002287.html，(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⑤ 日本外务省「台湾(Taiwan)基礎データ」，<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aiwan/data.html#section5>，(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⑥ 《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日本臺灣交流協會，www.koryu.or.jp/tw/business/gctf/，(2024年7月2日访问)。

统安全领域的区域合作的努力。

此外,日本在区域安全上的战略调整,如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也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①尽管日本的官方角色仍受到其“一个中国”政策的限制。在个人层面上,例如前首相安倍晋三与台湾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体现了日台关系的非正式但重要的一面。^②

总体来看,尽管存在政治和国际法的限制,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非正式层面上保持稳固并持续深化,这种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不仅基于共同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也反映了双方在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方面突破双边关系的尝试。

(二)运动概况

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在日本的起源、主要参与者和支持者构成一个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网络。该运动源于国际社会对台湾地位关注的增加。特别是在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地区统一力度的背景下,该运动在日本涉及多种多样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力量,包括某些政治家及亲中国的组织。

主要的参与者包括一些政治团体和个人,他们支持维持或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反对台湾独立。这些团体一般认为,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具体来说,部分保守的政治力量,如日本政要,以及亲华的社会团体、日本学者、华人华侨(详见表1),均可视为此运动的支持者。其通常通过发表言论、组织研讨会或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对话来推动其立场。

尽管存在诸多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内部对“台独”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些分歧可能源于对所谓“中国威胁”感的不同评估,或是对日本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不同看法。

总体而言,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呈现出多元化的参与者和复杂的动态,既包括政治层面的互动,也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因素。

二、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面临的挑战

(一)政治挑战

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面临的来自国内政治态度、法律和政策限制的挑战是重大且多方面的。日本、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间历史上和当前的政治动态在塑造该运动的可行性和战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日本的国内政治格局受到宪法和平主义及其对军事接触的限制的影响。这一原则限制了日本采取可被视为军事支持的强硬政治立场的能力,影响了其在台湾政治地位问题上的

① 胡啸宇:《日美同盟干涉台海问题:理论、方式及其趋势》,载《台海研究》2022年第2期,第88–97页。

② 《悼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總統: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讓更多台日合作開花結果》,“中華民國總統府”,www.president.gov.tw/NEWS/26805, (2024年7月2日访问)。

表1 支持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代表性组织和个人及其主张

组织 / 个人	代表性主张
(日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主张通过和平对话实现两岸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①
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②
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主张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实现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③
全日本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议会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支持祖国完全统一。 ^④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表达的明确立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 ^⑤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主张日本政府要充分理解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是一个整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 ^⑥
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	不希望海峡两岸发生战争,主张中日和平友好。 ^⑦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	钓鱼岛和台湾同属中国,曾被日本强行夺取。 ^⑧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	钓鱼岛和台湾的澎湖列岛一样,在《波茨坦宣言》被接受后就属于中国领土,应该归还给中国。 ^⑨
日本华文教育协会会长颜安	反对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期盼两岸和平统一。 ^⑩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组织数据制作而成。

① 《(日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http://jp.china-embassy.gov.cn/ztnew/200602/20060228_9415605.htm,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② 《一般社团法人东京华侨总会 就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仪式声明》,日本華僑華人聯合總會,<https://japan-chinese.org/pdf/taiwan.pdf>,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③ 《全华联就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一事 发布联合声明》,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https://www.ucrj.jp/news20240520/>,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④ 《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 2023年年会召开,全日本华人促统协议会会长郑正权视频致辞》,全日本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议会,<https://www.pcprj.org/topics/15490/>,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⑤ 《温家宝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www.gov.cn/ldhd/2007-12/28/content_845842.htm,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⑥ 《日政界人士批评日本重走军事化道路 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发展》,央视新闻客户端,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172881875577308526&toc_style_id=feeds_detail&track_id=209A5769-9854-46E9-99DB-77C1602F690D_737978374545&share_to=wechat,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⑦ 人民中国「在日本中国大使館が「台湾問題と中日関係」座談会を開催」,http://www.peoplechina.com.cn/zzjj/202405/20240522_800366876.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⑧ 《日本良知学者井上清:钓鱼岛是中国的》,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8/07/c_125131904.htm,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⑨ 《村田忠禧:日中应展开对话》,环球网,<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CET4>,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⑩ 《日本和统会:强烈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804/c1002-32494599.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行动。日本政府传统上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在台湾地区领土主权归属的问题上,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 2023 年 5 月 9 日回答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原口一博质询时,仅暧昧地表示,“十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台湾が中華人民共和国の領土の不可分の一部である」との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の立場を十分理解し、尊重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①并没有明确承认台湾地区归属中国。这一立场使得对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任何官方支持变得复杂,使得此类运动很难在日本国内获得正式承认或支持。

法律挑战还源于日本二战后的安排及其当前的外交立场。日本于 1951 年与同盟国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实际上放弃了日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②但日方辩称仅仅是放弃主权,并没有明确放弃的主权给哪个国家。这种模糊性也给日本留下了很多的法律空间,使其无法采取可能被解释为承认台湾主权或支持主张改变台湾当前政治地位的运动。

此外,政策限制还源于日本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战略利益。日本在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都拥有重大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因此需要采取平衡的做法,避免与中国对抗。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复杂的联盟网络,也影响着日本对台政策。日本国内任何支持“台独”或与中国统一的强烈运动,只要相关各方未同意,都可能破坏这些关系的稳定,并影响日本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这些限制使得日本国内任何反对“台独”或推动统一战略的运动都必须在狭隘而复杂的政治、法律和外交框架内进行。该运动必须谨慎应对这些挑战,以便在不违反日本国内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进行有效倡导。

(二)社会与文化挑战

在分析日本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知差异、文化障碍及其对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影响时,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考量日本对台湾的历史和文化认知,以及这些认知如何影响日本内部对台湾政治态势的看法。

首先,日本社会对台湾的文化和政治认知深受历史影响。自 1895 年至 1945 年间,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这一时期对台湾文化和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统治下,尽管存在压迫和同化政策,但也使得台湾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③这段历史使得部分日本人对台湾持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亲近感。^④

① 日本衆議院「衆議院議員原口一博君提出いわゆる一つの中国と台湾有事に関する質問に対する答弁書」,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211055.htm,(2024年7月2日访问)。

② 日本外務省『サンフランシスコ平和条約』,www.mofa.go.jp/mofaj/area/takeshima/pdfs/g_sfjjoyaku01.pdf,(2024年7月2日访问)。

③ 佐藤貴仁「現在を生きる台湾日本語世代の日本語によることばの活動の意味」『言語文化教育研究』2013年、第11卷、391-409頁。

④ 田村慶子「台湾現代史のなかの日本人——台湾に長期滞在する日本人への聞き取り調査から」『北九州市立大学法政論集』2022年、第50卷、第1?2合併号、1-29頁。

在日本国内，公众对台湾问题的认知存在差异。一部分日本人对台湾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台湾面临国际政治压力或自然灾害时。^①然而，也有一部分人更倾向于支持与中国的稳定关系，^②担心台湾问题可能影响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这种分歧在日本社会内部造成了一定的文化张力。

在文化层面，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个人的政治立场有着深远的影响。^③日本的教育体系长期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和社会和谐，这种教育对日本公众如何看待台湾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影响。这种教育背景可能使日本公众更倾向于支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观念，从而对“台独”持反对态度。

然而，现代日本社会中也存在着对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批评，^④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这一代人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和多元文化，^⑤可能对“台湾独立”问题持更开放或支持的态度。

总的来说，日本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知差异和文化障碍深刻影响了其对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态度和响应。历史的影响、教育背景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共同作用，形成了日本公众对这一问题复杂而多元的看法。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日本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提供了挑战，同时也指示了可能的对策方向，即在尊重历史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对台策略的调整。

(三) 国际关系影响

在探讨国际局势对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国际关系中的几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

首先，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对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有着重要影响。因为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强大的安全联盟，这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动具有深远影响。美国支持日本的安全保障，同时日本则扮演着美国在亚洲的关键盟友角色。这种关系使得日本在面对区域问题时，依赖于美国的支持。美国自 1979 年与台湾断交以来，一直坚持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明确表示将捍卫台湾地区免受中国的攻击，但同时强调

^①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訪台 總統盼台日一起守護區域和平及繁榮 攜手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中華民國總統府”，www.president.gov.tw/News/28372,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② 《李强会见日本经济界访华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www.fmprc.gov.cn/chn/gxh/tb/gdxw/202401/t20240125_11233255.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③ 斎藤泰雄「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礼におけるグローバリズムと国家主義」『国際基督教大学学報・IA 教育研究』2017 年、第 59 卷、149–157 頁；相澤真一「戦後の集団主義教育への歴史社会学的再接近」『日本教育学会大会研究発表要項』2021 年、第 80 卷、117–118 頁。

^④ 平木正直「片岡徳雄編著『集団主義教育の批判』」『教育学研究』1976 年、第 43 卷、第 4 号、380–381 頁。

^⑤ 落合惠美子「近代世界の転換と家族変動の論理 アジアとヨーロッパ」『社会学評論』2013 年、第 64 卷、第 4 号、533–552 頁。

不支持“台独”，^①这一立场的“战略模糊”是中国政府所不满的。^②美国对“台湾独立”的反对不仅是对中国的安抚，也是对台湾实际情况的认知。目前大多数台湾人对立即实现正式“独立”并不支持，^③这与美国的立场相符。日本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可能会使得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受到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会限制日本在此问题上的行动空间，从而影响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表达和行动。

其次，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于台湾问题也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中日关系受到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持续走低。这些因素导致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流减少，加剧了中国内部对日本的反感。日本政府也在国际事务中与西方国家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与美国等国家一起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对所谓现行秩序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干涉台湾问题的态度日益趋向积极，2021年12月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在台湾举行的线上研讨会时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④2024年1月10日，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访美时更是妄言“台湾有事是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⑤在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背景下，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减少这一运动在日本国内的受众和支持。尽管日本政府试图保持与中国的稳定关系，^⑥但两国间的政策和安全利益差异，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可能会使得反“台独”促统一运动更加复杂。

此外，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也对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产生影响。一些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对台当局的支持，包括台湾的民主制度、^⑦人权状况^⑧等方面，都为日本提供了支

① “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on Taiwan Elections.” The White House, 11 Jan. 2024,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4/01/11/background-press-call-by-a-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on-taiwan-elections/.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② 《2024年4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202404/t20240426_11289913.shtml，(2024年7月2日访问)。

③ 《〈遠見〉2023兩岸和平調查／近六成民眾希望兩岸維持現狀、達歷年高點》，遠見雜誌，www.gvm.com.tw/article/106795，(2024年7月2日访问)。

④ 朝日新聞デジタル「『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 安倍元首相が台湾のシンポでオンライン講演」，<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D15JMOPD1UHBI01K.html>，(2024年7月2日访问)。

⑤ 朝日新聞デジタル「『台湾有事は日本の存立危機事態』 麻生氏 米国で抑止力強化訴え」，www.asahi.com/articles/ASS1C56K6S1CUTFK004.html，(2024年7月2日访问)。

⑥ 日本外務省「日中首脳会談」，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1_001916.html，(2024年7月2日访问)。

⑦ “President Tsai addresses 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 2023.”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nglish.president.gov.tw/NEWS/6519.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⑧ “Taiwan Can Play a Leading Regional Role on Human Rights, but Sustained Commitment Needed, Says Amnesty's Secretary General Following Visit.”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3,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3/07/taiwan-can-play-a-leading-regional-role-on-human-rights-but-sustained-commitment-needed-says-amnestys-secretary-general-following-visit/#:~:text=Amnesty%20International%20has%20been%20working%20on%20Taiwan,the%20end%20of%20martial%20law%20in%201987. (2024年7月2日访问)。

持台湾的理由。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助于巩固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使得其在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中的立场更加复杂。

综上所述,国际局势特别是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对于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有效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国的立场、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都将影响日本政府和民众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行动。

三、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实施策略与活动

(一)组织与动员

在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中,组织和动员支持者的方式多样,其中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的运用特别显著,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快速、广泛传播信息和观点的平台。

首先,网络活动通常涉及使用facebook等社交媒体工具来传播信息,动员支持者,发表相关政治立场,以及组织线上和线下活动。^①这些平台使得组织者能够迅速响应,尤其是在面对紧急政治事件时,可以调动大量关注者和参与者的支持。

此外,网络宣传和信息战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通过创建专题页面,分享相关的新闻、文章和视频内容,以及举办在线讨论和活动来提高参与度,来塑造公众对台湾政策的看法,^②这种做法不仅限于日本国内,同时也针对国际社会,尝试影响外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态度。

网络平台上的讨论和内容发布,常常聚焦于对“台独”运动的批评,强调一中政策的重要性,^③以及推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种策略不仅加强了国内对反“台独”立场的支持,也可以在国际上争取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更广泛的策略中,日本反“台独”组织还通过网络研讨会、公开讲座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④来强化信息的传播和影响力。这些活动有助于教育公众,提高他们对台湾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同时也为运动争取到更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总之,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通过多渠道和多策略的方式组织和动员支持者,其中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运用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方法不仅增强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也加

^① 愛媛華僑・華人總会:《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代表成员奔赴马尼拉参加盛会并和世界各地成员广泛交流》,Facebook, www.facebook.com/ehime.chinese.association/posts/pfbid029UMwSrcxHrcRwQ2sXckhjCmorQnHjURNbGCyEJoSju1WvpY1DcCm7drSUN5wzCeWI.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② 《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 2023 年年会召开,全日本华人促统协议会会长郑正权视频致辞》,全日本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议会, www.peprj.org/topics/15490/,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③ 《日本和统会:强烈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人民网, world.people.com.cn/n1/2022/0804/c1002-32494599.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④ 《海外反“独”促统运动蓬勃发展,有这些组织的倾情参与》,中国台湾网, depts.taiwan.cn/news/201810/t20181024_12104902.htm, (2024年7月2日访问)。

深了公众对相关政治议题的参与和认知。

(二) 公共外交与宣传策略

在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公共外交和宣传策略方面,有几个关键元素可以帮助提升其影响力和公众支持。

首先,有效的信息宣传策略很重要。例如,中国在对台湾地区的宣传中经常利用文化和社会议题来构建“一个中国”的叙述,^①这种策略也被日本反“台独”组织借鉴。通过强调文化连续性和历史联系,如 2022 年 9 月 12 日,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在东京有乐町朝日馆举办了一场东方歌剧《宋氏三姐妹》,^②通过联结两岸的“宋氏三姐妹”的社会文化叙事,旨在深化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情感联系,同时削弱对“台独”的支持。

其次,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利用国际关系来增强信息传播。例如,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通过与日本主流媒体合作,^③或在国际会议和论坛上积极发声,来传播其立场。^④这种策略旨在塑造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增加其政策接受度。

此外,面对现代信息战的挑战,运动组织需要发展更复杂的数字战略,以应对和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力量。通过创建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社交媒体活动,可以有效地影响公众意见,并抵御敌对信息。例如,改进的数字信息宣传策略包括在 YouTube 上托管内容,^⑤同时在 Reddit 等平台上分发内容,^⑥以增强信息传播的持久性和抗干扰性。

这些策略的实施需要细致的策划和对目标受众深入的了解。通过结合传统的外交手段和现代的信息技术,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可以更有效地在国内外建立支持,推动其政治目标的实现。

① 李红梅:《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帝吧出征事件分析》,载《国际新闻界》2016 年第 38 卷第 11 期,第 91-113 页。

② 日本外务省「日中国交正常化 50 周年事業カレンダー」,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page22_003888.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③ 《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同日本主流媒体代表座谈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http://jp.china-embassy.gov.cn/mtdhnew/202209/20220915_10766412.htm,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④ 《关于华侨华人的国际会议召开 全日本华人促统协议会理事发表论文》,全日本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议会,2023 年 10 月 28 日,<https://www.pcprj.org/topics/15471/>,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⑤ 《來自全日本華僑華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唐亞明的新春祝福! | 紀錄台灣.》,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Q7mX0utcLg>,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⑥ 《日经:“尽管如此还是喜欢中国”隐藏在台湾军队中的死角:台湾,不为人知的真面目》,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China_irl/comments/11grb6g/,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三)跨组织合作

在分析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如何与其他组织或国际力量合作以增强其战略影响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考察。首先,这些组织在推动其政治议程时,往往寻求与类似思想的组织和政府建立联盟。例如,与中国大陆的团体或政府机构合作,^①以共同反对“台独”运动,支持两岸统一议题。这种合作可能涉及信息共享、战略规划和联合宣传等方面。

然而,除了与中国的合作外,这些组织也寻求与国际上持类似立场的团体进行合作。比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反对“台独”的其他组织,^②通过共同的国际会议、研讨会和公共活动来协调立场和行动。这种跨国界的合作有助于加强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国际论坛或联合国等平台来推广他们的政治观点。

这些活动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利用媒体和社交平台来推广统一的信息,反对台独的主张。通过撰写文章、发起在线活动、参与电视和广播节目等方式,这些组织可以扩大影响力,触达更广泛的受众。此外,通过与国际新闻机构合作,确保其观点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和接受。

此外,这些组织在策略上会利用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强调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历史纽带,以此来促进对统一的认同感。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历史研究和教育项目,可以增进两岸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好,从而为政治上的统一铺路。

综上所述,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以及利用媒体和文化策略,来增强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战略影响力。这种跨组织和跨国界的合作为其提供了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和资源,使其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统一的议程。

四、对策与策略建议

(一)运动策略优化

要优化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策略以适应日本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深入了解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以及公众对于政治运动的态度。以下是一些建议,以确保该运动在日本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一,加强社会对话和共识建立。运动应该致力于与不同社会群体展开对话和交流,包括政府、学界、宗教组织、企业界、以及民间团体等。通过倾听不同声音、理解各方需求和利益,建立共识和合作,共同推动统一事业。

^① 《郭燕公使出席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举办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暨新年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024年7月2日访问\)](http://jp.china-embassy.gov.cn/tpxwnew/201802/t20180206_9407227.htm)。

^② 《2023年菲律宾亚洲论坛发言稿》,全日本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议会,<https://www.pcprj.org/topics/15459/>,[\(2024年7月2日访问\)](https://www.pcprj.org/topics/15490/);《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2023年年会召开,全日本华人促统协会会长郑正权视频致辞》,全日本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议会,www.pcprj.org/topics/15490/,[\(2024年7月2日访问\)](https://www.pcprj.org/topics/15490/)。

第二,借助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在日本社会,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能够快速传播信息、引导舆论。因此,运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平台,通过发布信息、组织活动、呼吁参与等方式,扩大运动的影响范围,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第三,加强地方性组织和活动。在日本社会,地方性组织和活动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如住民自治组织。因此,运动可以加强与地方性组织的合作,开展各种地方性活动,促进统一观念在不同地区的传播和落地。

第四,培养领导者和志愿者。运动可以培养一批有理念、有魅力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的志愿者,在社会各个层面推动统一事业的发展。这些领导者和志愿者可以作为运动的中坚力量,为运动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综上所述,要优化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策略以适应日本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充分考虑社会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社会心理和社会组织特点,通过尊重和谐、利用传统文化、加强社会对话、借助社交媒体、注重情感共鸣、加强地方性组织和活动等方式,使运动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认同。

(二)公共外交

在探讨中国如何利用公共外交工具来提升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影响力和接受度时,中国首先可以通过媒体合作来支持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中国拥有庞大的媒体网络,可以通过在报纸、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正面报道、评论和分析,向日本民众传递积极的信息和观点。此外,中国的媒体可以与日本媒体开展合作项目,共同制作报道、纪录片等节目,以增进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了解和友好感情。

其次,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外交领域。中国可以通过教育合作项目,支持日本加强对历史事实的教育,特别是强调两国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友好合作。这可以通过向日本提供教材、举办教育交流活动、派遣教师和学者等方式实现。同时,中国还可以提供奖学金和交流项目,鼓励更多的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发展成就,从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此外,文化交流也是提升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影响力和接受度的重要途径。中国可以通过举办文化展览、艺术表演、电影节、音乐会等活动,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和当代文化成就,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同时,中国还可以支持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项目,如文化节、书展、电影合拍等,促进两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综上所述,通过充分利用媒体、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公共外交工具,中国可以有效地支持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提升其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和接受度。这不仅有助于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促进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三)国际合作

在探讨中国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加强日本境内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时,我们可以从国际政治和外交角度出发,分析中国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和举措。

首先,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来支持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双边合作可以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在政治上,中国可以与日本加强高层交往,促进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在经济上,中国可以提供经济支持和投资,帮助日本加强经济发展,增强其在地区内的影响力,从而有效遏制“台独”势力。在安全领域,两国可以加强情报交流和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可能的挑战和威胁。在文化领域,可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增进双方的友好感情,形成更加牢固的合作基础。

其次,中国可以通过参与多边合作机制来支持日本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地位。中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向国际社会传递反对“台独”的立场,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理解。例如,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中国可以与其他成员国密切合作,共同推动通过有关台湾问题的决议和声明,表明国际社会的一致立场。同时,中国还可以通过参与地区性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加强对日本境内反“台独”促统一运动的支持。中国拥有庞大的外交网络和专业的外交团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和公众传递积极的信息和观点。中国驻日本使馆和领事馆可以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如举办座谈会、研讨会、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密切沟通,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同时,中国还可以通过向日本提供援助和支持,帮助日本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增强日本政府和公众对中国的信任和支持。

综上所述,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双边合作、参与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通过外交手段加强支持,中国可以有效地加强日本境内的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为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促进中日友好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结论

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在当前政治与社会背景下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拥有应对挑战的潜力和策略。

首先,历史与文化背景对于理解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至关重要。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对运动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和理解。其次,政治、社会与文化挑战是制约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国内政治态度、法律限制、社会认知差异以及文化障碍都对运动的推进产生了影响,因此需要针对这些挑战提出相应的对策。第三,国际关系因素也对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产生着直接影响。特别是中日关系

和日美关系的变化会影响运动的有效性和战略定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国际局势对运动的影响。在实施策略与活动方面，组织动员、公共外交与宣传、跨组织合作等策略都是重要的手段，可以有效提升运动的影响力和战略实施。最后，针对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面临的挑战，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策略建议，包括政策倡议、公共外交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这些建议旨在为运动的持续发展和壮大提供指导和支持。

综上所述，日本反“台独”促统一运动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通过综合考量历史、政治、社会和国际因素，并采取有效的策略与对策，才能推动运动的持续发展，并为我国国家统一事业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日德开发银行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以产业政策工具的视角

侯筱辰

内容提要 开发银行作为产业政策的关键实施者，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旨在从产业政策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日本和德国开发银行的运作机制和模式，以及在各自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并围绕当今时代新工业革命这一重要主题，对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展开案例研究，以总结其不断更新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的开发银行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经研究发现，注重资源和政策的统筹协调，培育市场并适时调整支持方式，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模式和工具，都将有助于更大程度地发挥开发银行的作用。

关键词 日本 德国 中国 开发银行 产业政策

作者简介：侯筱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政府施行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自工业化以来，开发银行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开发银行是由国家政府设立或支持，为国家工业项目及其他重点领域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旨在推动国家工业化及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回顾历史，许多成功的工业化国家通过建立开发银行促进了结构转型，加快了工业化进程。而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改革下，很多国家转变了发展模式，开发银行也受到质疑，被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转变，开发银行的作用也有所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发银行的作用再度被重视。在如今国际形势复杂，经济持续低迷的后疫情时代，如何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是各国发展议程中最为关键的议题。政府如何发挥开发银行的最大效能，促进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显得尤其重要。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是开发银行典型的成功范例。它们成功地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并随着时代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变化，相应地对机构职能和运营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日德两国开发银行的运作机制和模式，并以新工业革命这一重要主题，对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进行具体的案例研究，以总结其不断更新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的开发银行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德国、日本、中国开发银行的建立及发展历程

(一)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成立于1948年，旨在为德国产业和经济重建提供金融支持，促

进出口并管理马歇尔援助资金。50年代前半期,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重点支持能源产业(煤炭、钢铁、电力等)与房屋重建项目,为德国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50年代后半期,其业务重心逐渐转移到扶持德国制造业、推动其出口,并同时开始通过向市场发行中长期债券进行融资。60年代开始,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被依法授权开展向发展中国家发放援助贷款的业务,在输出资本的同时带动了德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积极扶持德国中小企业,为制造业海外出口提供信贷。80年代初,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开始进入金融市场,进行市场化融资。^①

2000年以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组织结构调整。2001年6月,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收购负责民间开发融资的德国发展公司(DEG)。德国发展公司原来是负责振兴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民间企业的德国政策性金融机构。2003年8月,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结构调整工程的重要一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兼并了负责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德国调整银行(又称德国清算银行,DtA)。德国调整银行成立于1950年,属于国家机构,主要职责是对中小企业和起步项目发放贷款并行使调控银行的职能。合并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德国清算银行将各自负责的中小企业业务统一转给新成立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中小企业银行(KfW Mittelstands Bank),该机构随之成为负责所有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窗口。2004年1月,负责商业金融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国际项目融资和出口信贷银行(KFWIPEX-Bank)成立,根据欧盟(EU)的意见,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与商业金融部门分离。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国际项目融资和出口信贷银行于2008年1月成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独立子公司。

目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由4个业务本部和5个子公司组成,业务领域包括德国和欧洲的投资信贷、出口信贷和项目融资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财政合作与咨询等业务。各项业务由相应业务单元、子银行(公司)来完成。旗下四个子银行(公司)分别是中小企业行、促进银行、国际项目融资和出口信贷银行及开发银行,分管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几项主要业务。

(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DBJ)的前身日本开发银行成立于1951年,主要为国内重要产业(煤炭、钢铁等)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战后复苏。它还致力于为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能源和电力供应基础设施)提供长期信贷,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20世纪70—90年代,日本开发银行开始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将其支持范围扩大到风力发电项目和废物处理设施等新项目。随着对重要公用事业部门的放松管制,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开始运用现代项目融资方式来支持基础设施领域的私人投资。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及亚

^①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75 years of KfW”, <https://www.KfW.de/stories/75-years.html>, (2024年3月17日访问)。

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规模膨胀、不平等竞争、财政坏账累积问题日益凸显,且财政投融资体系效率低下、透明度低问题越发严重,日本开始对金融体制和政府投融资制度进行改革。

1999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同年10月,日本开发银行与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合并,成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同时,依据《国际协力银行法》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合并为国际协力银行,并对公库进行清理与重组,使得日本形成“2行6库”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即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国际协力银行,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冲绳振业开发金融公库、住房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公营企业金融公库,涉及国家发展与国民生活的重要方面。重组后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依法坚持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性质与定位,密切配合政府政策目标。在《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框架下,确立了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作为由政府全额出资和所有的政府性法人的特殊法人地位。法律明确规定,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宗旨是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提供补充和支持,以充分推动能源工业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促进地方经济独立发展;并通过提供中长期资金及其他业务方面的支持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①

(三)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当时中国经济相对缓慢,基础设施落后,电力、煤炭、石油、石化等产业是瓶颈,城市基础设施和民生问题都急需改善。金融机构机制不完善,还处于计划经济模式,所以需要建立开行这样的机构,推动国家工业化,促进产业发展。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任务为提倡和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中大中型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革等政策性项目及其配套工程的建设,从资金来源上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控制和调节,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② 在初创阶段,由于政策性金融特点显著,投资项目主要以政府推荐、参考计划部门审批为前提,带有明显的政府计划色彩,经营中“项目靠计划推荐、资金靠摊派发债、管理靠商行委代”的现状使得银行不良资产率迅速攀升,短短四年内不良贷款比率高达40%,使国开行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风险。1998年开始,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的新思路下,随后接连进行了三次信贷改革,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开发性金融模式。2004年,时任国开行行长的陈元提出“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二十字方针。^③

2008年12月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商业化转型的探索。然而,国开行的商业化发展一方面面临自身资金渠道受限、融资成本上升、负债能力降低问题;另一方面由

^① 日本政策投資銀行,「株式会社日本政策投資銀行法」,<https://www.dbj.jp/co/info/law.html>, (2024年3月17日访问)。

^② 《国家开发银行章程》,<http://www.reformdata.org/1994/0317/15592.shtml>, (2024年3月17日访问)。

^③ 陈元:《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于国开行当前业务横跨政策性和商业性项目,涉猎范围较广,对于适用的监管政策尚且没有明确规定,给现有商业银行的发展造成压力,也为自身进一步发展带来阻碍。

2015年3月,国务院明确国开行定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坚持发挥中长期投融资的优势和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和开发性方法服务国家战略”。^①国开行开发性金融定位和发展理念再次明确并得到政府肯定,即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充分运用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开发性金融运作模式,积极发挥在稳增长、调结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2017年4月,“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国家开发银行”,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三国开发银行的模式特点及其比较

(一)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主要从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两方面来体现。开发银行的组织形式主要指外部机构设置的类型,可分为单一制和总分行制两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采用单一制组织形式,除德国统一后接收原民主德国的柏林国家银行作为自己分支机构外,没有任何分支机构,而是通过商业银行网络开展业务。2004年1月,负责商业金融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国际项目融资和出口信贷银行(KFWIPEX-Bank)成立,并于2008年1月成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独立子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就此形成政策性、商业性业务分离开展的组织形式。

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均属于总分行制机构,即指在大型城市设立总行或总部作为中央机构,并根据业务特点及发展需要在国内或国外设立一定数量的一级分行或代表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总部设在东京,在国内主要城市大阪、名古屋等设有7个分行,分行下辖6个事务所,且在国外的华盛顿等地设有5个事务所或海外办事处。分行不单独核算、不办理资金拨付业务,资金全部由总行划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北京,目前,国开行境内分行38家;境外代表处11家;主要控股子公司5家。

治理结构方面,各国的开发银行中,一般理事会或董事会都是其最高决策权力层次,机构主要官员一般由国家政府首脑直接任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为董事会,并设有执行委员会、信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各部门职能。董事会及建立的系列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与联邦及各州政府、各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间的利益,以使得决策时兼顾多方利益。董事会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章程批准和审议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相关决议,对联邦财政部门、经济技术部以及联邦审计署负有监管职责。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最高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由总裁、副总裁各1名,8名理事,2名监事和6名参事组成,总裁、副

^① 《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中国政府网,[\(2024年3月19日访问\)](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4/12/content_9596.htm)。

总裁由首相任命,任期为4年;其余由总裁任命,任期为2年。^①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之初,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编制方案,由国务院直接任命行长、副行长,实行行长负责制,设副行长4人、纪委书记1人,行长助理3人,并根据行业分工、审贷合一的原则设立机关部室,同时还设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稽核师各一名。2008年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其治理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不断推进标准化公司治理建设,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三会一层”的运行机制,董事长仍由政府机构任命。

(二)融资模式

国别开发银行与商业银行不同,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需要在保持自身经营状况和实现发展任务方面做出平衡。且国别开发银行所支持的项目一般是商业银行不愿意投资的,周期长、风险大但对国家发展有正外部性的项目,所以国别开发银行在资金筹措方面面临挑战,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的支持。国别开发银行的筹资方式主要有:(1)来自本国政府(包括中央银行)的资本金、借款、存款、赠款、补助和服务费等;(2)在本国或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3)来自国际公共机构(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援助机构、外国开发银行等)的转贷款或官方发展援助;(4)国别开发银行自身利润的留存收益;(5)吸收企业或居民的存款。^②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债券来筹集大部分资金(如2015年,此比例超过80%)。^③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法律,这些债券由联邦政府提供隐性信用担保。^④所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债券被认为是安全、长期的投资,值得持有。且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债券的货币组合相当多样化,包括欧元、美元、澳元和日元,这意味着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债券的信用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⑤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主要是通过市场化融资,德国联邦政府主要是提供信用担保,较少直接参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筹资过程。

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以雄厚的财政援助为后盾,是典型的财政融资型银行。政府向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长期提供低成本乃至无偿的财政性资金、财政担保、税收优惠、亏损补贴等。《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也规定必要时政府可以按照预算中规定数额向银行提供额外投资。^⑥

^①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Corporate Governance”, <https://www.dbj.jp/en/sustainability/effort/foundation/governance/index.html>, (2024年3月19日访问)。

^② 徐佳君、王可第、茹新顺:《国别开发银行的资金来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2021年。

^③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 Annual Report, [https://www.KfW.de/KfW-Group/Service/Download-Center/Financial-Publications-\(D-EN\)/Gesch%C3%A4ftsbericht/](https://www.KfW.de/KfW-Group/Service/Download-Center/Financial-Publications-(D-EN)/Gesch%C3%A4ftsbericht/), (2024年3月19日访问)。

^④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Law Concerning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https://www.KfW.de/Download-Center/KfW-Gesetz-und-Satzung-sowie-Gesch%C3%A4ftsordnungen/Law-concerning-KfW-and-KfW_By-laws/KfW_Gesetz_E.pdf, (2024年3月19日访问)。

^⑤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 Financial Report 2015, [https://www.KfW.de/KfW-Group/Service/Download-Center/Financial-Publications-\(D-EN/Finanzbericht/](https://www.KfW.de/KfW-Group/Service/Download-Center/Financial-Publications-(D-EN/Finanzbericht/), (2024年3月19日访问)。

^⑥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株式会社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https://www.dbj.jp/co/info/law.html>, (2024年3月17日访问)。

虽然以财政融资模式为主体,但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严格按照金融规则在银行框架内运行,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与外部各方保持合理协调的关系,并呈现出市场融资新趋势,通过获取低成本资金并提高融资及运行效率坚持不亏损原则。

基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实践经验,以及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成熟,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最终采用了一种综合以储蓄为基础的日本模式和以债券为基础的德国模式的筹资方式。^①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创立之初,国务院即规定其资金来源为资本金、政策性金融债券、中央银行再贷款、财政贴息资金、外汇筹资、企业存款等。随着国开行不断地调整与改革,财政贴息资金逐渐被取消,2008年体制改革后,商业性业务收益也成为其资金来源的一条新兴渠道。国开行在探索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资本金为基础、债券融资为主、中央银行再贷款为补充的国际化、现代化融资机制。由国家出资500亿作为资本金,国家给予国开行准主权国家级信用,且国开行享有在市场上发行金融债券的特许权,是其市场化运作的基础。^②国开行不依靠财政,主要选择促进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且可用市场化机制还款的项目,以地方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在项目还款困难时作为补充或补偿。^③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发行债券一样,因国开行债券享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授予的“零风险权重”,得到了国家信用担保支持,能够吸引投资者购买。而与德国模式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不同的是,国开行债券主要是在国内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国内的商业银行是主要的投资者,资金来源与日本模式一样,主要是国内储蓄。

(三)模式比较

三个国家的国别开发银行在成立背景和性质上基本相同,都是为了推动促进本国工业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关注基础设施、重要产业部门等领域。但在具体的组织形式、治理结构、融资模式略有区别(如表1),也体现了其模式的特点。相比较而言,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更偏政策性,融资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财政投资贷款计划;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融资方式更偏市场化,主要通过以德国联邦政府的担保为基础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债券来筹措大部分资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模式介于两者之间,即坚持政府的政策性目标,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在国内债券市场利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融资。

^① Muyang Chen, “State Actors, Market Games: Credit Guarantees and the Funding of China Development Bank”,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25, No.3 (2020), pp.453–468.

^② 国家开发银行 - 华中科技大学联合课题组:《开发性金融理论与实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③ 本人对贷款专家的采访,北京,访谈时间:2021年8月18日。

表1 德日中国别开发银行模式特点比较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经营目标	促进德国经济发展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充分推动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促进地方经济独立发展	以市场化方式和开发性方法服务国家战略,改善民生,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业务范围	政策性业务包括:针对中小企业、创业者和新建企业的融资、促进住工业、环保和气候保护、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贷款、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合作。商业业务(出口信贷、项目融资、投资及公司贷款业务等)与母公司分离,单独设立子公司运行	以提供中长期贷款为首要业务活动,严格按照政府政策意图进行。关注环境、产业结构改革、新技术开发、国际化进程等领域	以信贷业务为主,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中大中型基础建设和技术改革等政策性项目及其配套工程的建设
法律依据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不受《德国银行法》监管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不受普通《银行法》制约	尚无专门立法,仅依据《国家开发银行章程》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提及
监管机构	德国财政部,也成立由政府部门领导组成的监事会对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业务进行监督	财务省	中央银行、银监会,混同于一般的银行业机构,为体现其监管上应有的特殊性
融资模式	资本金:100%政府出资,其中联邦政府持股80%,各州持股20%,资本金由利润补充。 筹资主要依赖债券发行,不吸收存款	资本金100%政府出资,利润中提取准备金后,其余全部上缴国库。每年约80%左右的资金来自财务省管辖的邮政储蓄;其余由发行债券或向外国借款来筹集资金	资本金最初为500亿元,由财政部核拨;后汇金公司入股,资本金增至3000亿元。主要通过发行本外币债券进行资金筹集,以资产证券化业务改善资本流动性
组织形式	单一制	总分行制	总分行制
治理结构	最高决策机构为董事会,并设有执行委员会、信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各部门职能	最高领导机构为理事会,总裁、副总裁由首相任命,其余由总裁任命。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三会一层”的运行机制,董事长由政府机构任命

来源:笔者自制。

三、作为产业政策工具的开发银行功能与运作机制

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来看,工业化和更普遍的创业活动将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改善整体福利。但其中最严重的制约因素是缺乏长期贷款,不仅大型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缺乏长期贷款,^①而且承担新技术和生产工艺发现成本的新企业也缺乏长期贷款。^②基于产业

^①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张凤林译:《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55页。

^② Ricardo Hausmann, Dani Rodrik,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72, No.2 (2003), pp.603-633.

政策的视角,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其直接好处在于使国家工业部门释放潜在能力,从而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①但这些潜在能力通常风险太大或很难识别,无法通过私人金融体系进行开发。

德国和日本的国别开发银行的发展与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开发银行作为产业政策工具,在支持重点产业、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力推动了国家工业化发展。从战后重建到后工业化时代,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始终扮演着支持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业务重点(如表2),为德国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样,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在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表3),通过对重要产业提供贷款和投资、支持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方式,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升级。同时,该行还注重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问题,为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开发银行为什么以及如何作为有效的产业政策工具?相比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具有特定的优势和功能,能够发挥反周期金融的宏观经济角色来应对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弥补市场失

表2 德国工业化阶段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业务重点

工业化阶段	德国宏观经济情况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业务重点
经济恢复期 (1948—1953年)	战后重建 以原料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起步时代,为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支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建能源供应体系,重点产业为:采矿业、钢铁业、电力;重工业部门;住房、农业。
工业化中期 (1954—1970年)	经济快速发展 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中心的制造业 中小企业开始发展 逐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支持国家重点制造业,为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帮助,业务重心转向对外发展融资,业务重点为:重点支柱产业、中小企业融资、优惠的出口信贷。
工业化后期 (1971—1989年)	受到石油危机冲击,经济增长放缓 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中心的制造业 经济结构和地区发展出现一些问题	业务重心移回德国本土,扩大对德国国内的投资和贷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发展平衡,重视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以及高科技、环保、出口等行业和领域。
后工业化 (1990至今)	德国统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 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东德经济体制转型	90年代主要支持东德经济恢复,支持领域集中在产业投资、住房现代化、公共基础设施改扩建; 2000年之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进行了重组,重视精简化与重视新兴产业孵化,重点支持贸易和对外投资、中小企业孵化。

来源:笔者自制。

^① Dani Rodrik,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4767, 2004.

表3 日本工业化阶段与日本开发银行

工业化阶段	日本宏观经济情况	日本开发银行业务重点
经济恢复期 (1946—1955年)	面临战后经济重建,处在经济恢复阶段	日本开发银行建立,并配合政府“倾斜生产方式”的政策,把贷款集中投放到电力、海运、煤炭和钢铁等四大基础工业部门,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工业化中期 (1956—1973年)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四大基础工业部门已走出“瓶颈”,商业性金融和私人资本向该领域的投资大为增加;金融自由化逐渐展开,地区经济呈现出较高的差异化。	转向机械工业、石油化工和合成纤维等新兴工业领域投资贷款;在发展区域经济、城市规划和居民住宅建设方面提供资金支持。
工业化后期 (1974—1992年)	经历了能源危机;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持续衰退期,日本经济改革加速,产业政策从产业调整转向经济结构改革,即为经济增长构建新体制基础的改革。	进一步扩大到提供新能源、新技术开发的贷款:例如风力发电,或者东京煤气公司开发的燃料电池;将重点投向新技术开发,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配合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改进城市化建设和分销网络,加速城市化进程;关注社会福利制度和设施建设等。
后工业化 (1993年至今)	金融自由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	业务更加多元,包括生物、高科技等产业,同时更加关注国际化进程、环境问题以及新技术开发领域。1999年,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把地方开发、环境保护、新技术开发作为三大业务领域。

来源:笔者自制。

灵,为风险大、贷款周期长,但具有正外部性且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部门提供大量定向信贷。

其一,开发银行通常有国家支持获得财政贷款等低成本的资金,或由国家作为担保,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能够在资本市场融资,从而为重要的产业项目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长期贷款。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基于联邦政府的信用担保,能够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筹集大部分的资金。日本开发银行从政府的财政投资贷款计划(FILP)借入资金,而财政投资贷款计划的资金来源是日本民众缴纳的邮政储蓄和保险费。财政投资贷款计划被称为“第二预算”,有别于一般预算拨款,不受详细的政治审查。因此,日本邮政储蓄银行在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同时,在使用资金方面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权和灵活性。^①

其二,开发银行具有相关领域的行业技术专家,相比商业银行更具有技术专长,能够有效识别潜在风险。开发银行通常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识别潜在项目,并且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提供

^① Kazuto Tsuji, “Revisiting Policy-Based Financing: Experiences of Japan, A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in Hiroshi Kato, John Page, Yasutami Shimomura eds., Japan’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eign Aid and the Post-2015 Agend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6, pp.188–204.

技术援助。^①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自然资源和土木工程等领域拥有技术专家,这在实质上有别于商业银行部门。它使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能够根据内部员工提供的一套更广泛的标准做出投资决策,而不是依赖于一般市场或咨询公司等外部参与者。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对各部门和相关市场的深入了解,不仅有助于发现市场的不完善之处,还有助于预测相关干预措施和计划的后果,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特定项目取得成功的可能性。^②

其三,开发银行具有信息生产和政策信息传递的功能,能够有效引入私人资本。以日本开发银行贷款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发挥了有关单个企业增长潜力的信息生产功能,能够提供其他金融机构原本无法获得的金融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对私营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③同时,开发银行的贷款往往为企业和其他银行提供了政府要着力发展的领域的相关信息,具有政策信息传递的功能。^④不少实证研究发现,银行贷款通过“信息效应”促进了私营部门的资本投资。^⑤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信息生产能力,源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中的“中立性”和“公共性”。^⑥通过利用开发银行的审查信息,民间银行也会进行合作融资。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存在资本投资刺激效应,尤其对没有稳定银行关系的企业影响较大。^⑦从日本发展银行获得更多贷款的企业,能够从其他金融机构借入更多资金,进行相对于其总资产更大的资本投资。^⑧除耐心资本外,开发银行还可提供担保,为发展项目从私营部门释放更多资本。^⑨

① Beatriz Armendariz De Aghion, “Development Bank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8, No.1 (1999), pp.83–100.

② Ulf Moslener Matthias Thiemann, and Peter Volberd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as Active Financiers: The Case of KfW”, in Stephany Griffith-Jones, and José Antonio Ocampo eds., *The Futur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63–85.

③ 福田慎一、照山博司、神谷明広、計聰「製造業における政策金融の誘導効果」*経済企画庁『経済分析』*1995年、第140号、1–55頁。

④ Jonathan Di Joh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anking”, in Arkebe Oqubay, Christopher Cramer, Ha-Joon Chang, and Richard Kozul-Wright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337–368.

⑤ 堀内昭義、隨清遠「情報生産者としての開発銀行—その機能と限界—」、貝塚啓明、植田和男編『変革期の金融システム』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143–171頁。

⑥ クラブ財としての公的金融と「民営化」問題 – 日本政策投資銀行をモデルとして – 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jssiss/57/2/57_141/_pdf, 2024年4月13日訪問。

⑦ 堀内昭義、隨清遠「企業の成長と開発銀行融資の機能」東京大学経済学部, 1992年。

⑧ 嶋田雄斗、石田知也「日本政策投資銀行の融資が企業財務に与える効果の検証」*日本経済学会2016年度秋季大会報告*。

⑨ Allan L. Riding, George Haines Jr, “Loan guarantees: Costs of default and benefits to small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16, No.6 (2001), pp.595–612.

Salvatore Zecchini, Marco Ventura, “The impact of public guarantees on credit to SM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32(2009), pp.191–206.

四、新工业革命时代下的开发银行战略调整与创新

工业 4.0 和社会 5.0 是德日两国现阶段在产业发展上面临危机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发达国家自身在产业升级换代上面临缺乏灵活性的困境，以及后发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对先进国家的追赶。与此同时，两国的开发银行都进行了对应的调整和创新，大力支持国家战略的实施。

(一)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助推“工业 4.0”战略的实施与成效分析

1. 德国“工业 4.0”概述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支持方式

德国工业 4.0 战略是以智能制造为核心，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突破口，辅以治理的革命，反映了工业经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融汇成网络化发展的新潮流。工业 4.0 战略首先由民间的德国工业研究联盟发起，其重要性得到官方层面的认可后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德国政府力推的“德国高技术战略 2020”十大未来项目之一。

为了推动工业 4.0 及提高德国作为科技强国的地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设立“未来基金”，即前瞻性技术风险投资基金，为处于孵化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联邦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未来基金”提供 100 亿欧元，以促进德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未来基金在数量和质量上扩大了现有的资助计划，并开发了新的融资工具，旨在为初创企业进行扩大成长型融资，并更多地考虑以前未充分覆盖的细分市场。^①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还参与投资其他风险投资资金。在被称为种子期的早期阶段，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自 2005 年以来一直参与 High-Tech Gründerfonds (HTGF)，这是德国最大、最活跃的早期融资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 HTGF 仅次于联邦政府的最大投资者。^② 自 2015 年 4 月起，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还开始帮助年轻的创新技术公司解决后续和扩张融资不足的问题。这些从事清洁技术、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领域的高科技公司，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和其他“数字化”初创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发展壮大。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与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 (BMWi) 合作，向市场推出了一种新的促进工具——ERP 风险投资基金。^③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利用这一工具，通过选定的德国和欧洲风险投资基金，间接投资于德国年轻的技术公司。

2018 年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成立子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本公司 (KfW Capital)，开始

^①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Launch of the “Zukunftsfoonds” – Federal Government Bolsters Financing for Start-ups in Germany”, [\(2024 年 3 月 21 日访问\)](https://www.KfW.de/About-KfW/Newsroom/Latest-News/Pressemitteilungen-Details_643072.html)。

^②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Equity Finance”, [\(2024 年 3 月 21 日访问\)](https://www.KfW.de/About-KfW/Newsroom/The-men-kompakt/Beteiligungsfinanzierung/)。

^③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Action, “Financing Start-ups and Growth: Overview of Funding Instruments”, [\(2024 年 3 月 21 日访问\)](https://www.plattform-i40.de/Redaktion/EN/Downloads/financing-start-ups-and-growth-overview-of-funding-instrument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1)。

拓展投资业务，旨在大力加强风险资本融资市场，使其成为德国经济的推动力。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一方面通过成立或投资风投基金支持初创企业的孵化和发展，与此同时，培育支持德国风投公司的发展，培育德国的初创企业风投市场。

2. 代表性项目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高科技基金(HTGF)为初创企业和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高科技基金成立于2005年，是由联邦经济部代表、工业界和行业专家组成的工作组设立，旨在重振当时完全沉寂的初创企业融资市场。高科技基金实质上是由德国政府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牵头、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注资建立的、面向孵化阶段初创企业的风投基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高科技基金仅次于联邦政府的最大投资者。自2005年以来，高科技基金已成功推出了四支基金，共管理约14亿欧元，已为工业技术、数字技术、生命科学和化工领域的700多家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其中170多家公司已成功出售或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除种子投资外，约有50亿欧元的私人资金通过后续融资流入高科技基金投资的公司。^①

高科技基金的孵化案例如诺和诺德收购卡迪奥制药公司(Cardior Pharmaceuticals)，高科技基金成功退出。卡迪奥是发现和开发以RNA为靶点疗法的领先企业，这些疗法可预防、修复和逆转心脏疾病。公司的治疗方法以独特的非编码RNA为目标，将其作为解决心脏功能障碍根本原因的平台，旨在对患者产生持久的影响。在卡迪奥早期阶段，高科技基金相信团队的愿景和RNA技术的潜力，参与了2017年的第一轮融资。2024年3月25日，诺和诺德与卡迪奥制药公司宣布，诺和诺德已同意以高达10.25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卡迪奥，其中包括预付款以及在实现某些开发和商业里程碑后的额外付款。欧洲领先的种子投资者之一高科技基金将出售其股份。诺和诺德对卡迪奥的收购是高科技基金制药投资组合中又一个总价达十亿美元的潜在收购项目，彰显了高科技基金在生命科学公司种子融资领域的强势地位。^②

此外，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利用ERP风险投资基金投资这一工具，间接投资于德国年轻的技术公司。该工具使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能够依靠风险投资基金市场的专业知识，并作为国有促进银行调动私募股权。自2015年启动ERP风险投资基金投资计划以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已向18个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了总计2.65亿欧元。^③2018年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进行业务拆分，将初创企业风投业务转移至新成立的子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本公司(KfW Capital)。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本公司将向德国和欧洲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发展基金投资最多不超过20%的资金(2,500万欧元)，投资决策标准之一是，接受投资的基金必须至少将相同金额

^① High-Tech Gründerfonds, “The High-Tech Gründerfonds”, <https://www.htgf.de/en/about-us/>, (2024年3月21日访问)。

^② High-Tech Gründerfonds, “Successful Exit for HTGF: Novo Nordisk to Acquire Cardior Pharmaceuticals”, <https://www.htgf.de/en/htgf-exit-cardior-pharmaceuticals/>, (2024年3月21日访问)。

^③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Equity Finance”, <https://www.KfW.de/About-KfW/Newsroom/The-men-kompakt/Beteiligungsfinanzierung/>, (2024年3月21日访问)。

的资金再次投资于德国科技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本公司将投资于整个行业的基金,包括由经验丰富的基金管理公司运作的后续基金和首次设立的基金。此做法旨在振兴整个风险资本融资市场,使其成为德国经济的推动力。2023年,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本公司对德国初创企业和年轻创新型技术公司的投资承诺达到约21亿欧元(2022年为13亿欧元),增幅为69%。^①随着成长基金的最终结束,德国风险投资生态系统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幅地调动了私人资本。

综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更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开发创新金融工具,通过不同阶段不同支持方式,实现从“政府直接支持”转变为“政府通过市场支持+政府培育风投市场”,当市场成熟转为“风投市场自发运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实现退出。

(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支持“社会5.0”战略的实践与启示

1.日本“社会5.0”概述及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支持方式

2016年1月,日本内阁批准的《第五期(2016—2020年度)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是一项由包括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和公众在内的广泛利益攸关方共同实施的计划,大力推进科技技术与创新政策,旨在引领日本成为“世界上最有利于创新的国家”。《第五期(2016—2020年度)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创造未来产业和社会变革;二是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三是加强基础设施能力;四是建立人力、知识和财政资源的良性循环系统。^②其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基于“超智能社会”的“社会5.0”(Society 5.0)概念,是继狩猎社会(社会1.0)、农业社会(社会2.0)、工业社会(社会3.0)和信息社会(社会4.0)之后的新社会,即“通过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高度融合的系统,平衡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以人为本的社会”。2021年3月批准的《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将“社会5.0”进一步具象化,即“一个可持续发展、有韧性、确保人民安全和有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即可以将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在所需的时间按所需量提供给所需之人,能够精细地应对社会各种需求,使人人都能享受高质量的服务,超越年龄、性别、地区、语言等差异,是一个充满活力、适宜生活的社会”。^③

为了支持社会5.0战略的实施,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专门设立了“社会5.0挑战投资计划”(“Society 5.0 Challenge Investment System”)作为新的框架,投资于有助于创建可持续社会的活动,旨在创造具有新价值的新产业,以解决日本面临的社会挑战。此计划有利于支持那些

^①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 is Expanding Promotion for Affordable Housing and Climate-Friendly Refurbishment in Germany in 2024”, [\(2024年3月21日访问\)](https://www.KfW.de/About-KfW/Newsroom/Latest-News/Pressemitteilungen-Details_795392.html)。

^② 内閣府,“第5期科学技術基本計画の概要”,[\(2024年3月23日访问\)](https://www8.cao.go.jp/cstp/kihonkeikaku/5gaiyo.pdf)。

^③ 内閣府,“Society 5.0とは”,[\(2024年3月23日访问\)](https://www8.cao.go.jp/cstp/society5_0/index.html)。

难以用传统价值来衡量但有望对解决社会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除了“社会 5.0”中定义的网络 - 物理融合领域,该范围还将涵盖一系列硬件主导的领域(如下一代电池、空中机动性等)。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在保持中立金融投资者地位的前提下,希望建立一个治理结构,或作为一项业务,而非作为一项研究或慈善活动,希望通过参与管理,推动创建能够在市场经济规则下适当分散风险的基础上开展可持续商业活动的组织。^①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支持社会 5.0 战略实施的具体支持方式主要包括:一是为初创企业和战略性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或投资;二是提供经营管理、并购、与政府联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支持;三是支持建设创新孵化平台、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等外围软硬设施。

2. 代表性项目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通过“社会 5.0 投资计划”对初创企业进行直接投资。2020 年 7 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通过社会 5.0 投资计划对 SkyDrive 进行了投资。SkyDrive 位于东京新宿区,是一家日本初创企业,致力于开发、制造和销售下一代空中移动“飞行汽车”(可运送人员)和“物流无人机”(可运送重物)。飞行汽车是一种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载人飞机。与直升机等现有飞行器相比,飞行汽车可以大大降低制造和运营成本。作为世界各地社区的替代交通工具,飞行汽车的需求预计将迅速增长,特别是在长期存在交通拥堵问题的城市地区。在日本,飞行汽车有望在建立可持续交通系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飞行汽车不受地面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可以避免城市交通拥堵造成的经济损失。此外,飞行汽车还能有效减轻维修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该系统还可以通过促进旅游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为振兴当地经济做出贡献,并通过救灾和其他方式帮助建设安全、可靠的当地社区。而且,随着国内劳动力的减少,物流无人机可用于各行各业的货物运输。通过这项投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不仅支持了公司本身,同时作为 SkyDrive、政府和各行各业公司之间的纽带,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参与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提高有效利用的空域,实现向可持续社会的快速过渡。^②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与其他机构合作建立创新支持和成果转化平台。自 2017 年 9 月签署全面合作协议以来,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通过多种方式深化了合作。其中一项工作是“AIST&DBJ2050 年创业计划”(AIST&DBJ VENTURE2050),通过该计划,两家机构结合自身优势,支持和激励创建有可能对 2050 年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开拓性企业。^①根据该计划,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将组成一个联合研究团队,为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技术和研究成果提供必要的支持,这些技术和研究成

^①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イノベーション活動への新たな挑戦~「Society5.0 挑戦投資制度」創設と「知の価値化」”,https://www.dbj.jp/topics/dbj_news/2020/html/20200706_202678.html, (2024 年 3 月 23 日访问)。

^②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DBJ Invests in SkyDrive through the Society 5.0 Investment Program”, https://www.dbj.jp/en/topics/case/html/dbj_invests_in_skydrive_through_the_society_50_investment_program.html, (2024 年 3 月 23 日访问)。

果有可能为 2050 年的社会带来创新,例如开发商业化的管理基础和促进研发,目的是创建合作企业。在设立合资企业时,双方将共同努力,为合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长期支持,例如通过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社会 5.0 挑战投资计划”进行投资等管理支持、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持续技术支持以及利用两家公司的网络创建新的业务组合项目。^② 通过将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研发和技术能力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金融和商业化专业知识相结合,该计划旨在创建以技术为基础的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努力实现以人为本的“5.0 社会”所需的广泛创新。

此外,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集团的先驱智库日本经济研究所(JERI)合作,建立了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创新中心(DBJ iHub)。该中心是一个与企业、政府和专家等各类志愿者进行对话和创造的“场所”,旨在通过开放式创新以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③ 该中心将作为一个专家团队,为项目的规划、概念验证和运营阶段提供支持;使用新的业务开发和创新启蒙计划(例如,价值创造管理研究小组)来培训创新人才;使用开放式创新来开发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解决方案,并将其作为具体计划和项目在社会中实施。^④

综上,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更偏向政策性的模式,主要通过提供优惠贷款,以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引导创新企业的发展;同时,还大力提供政策性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如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平台,更大程度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广泛的创新,培养创新人才,推动技术企业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实现创新的正外部性效应。

五、对中国开发银行的启示与借鉴

结合前述分析,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在完成推动本国实现工业化的使命之后,根据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适时调整职能和政策重点,并在推动新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有力的促进作用,其成功经验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两国开发银行在推动工业化等领域的发展时都十分重视统筹协调。银行内部会根据重点业务特点,在业务领域和融资工具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并形成一套政策框架。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推动工业 4.0 战略实现的过程中,为了推动科技创新,针对初创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设立了不同基金,满足初创企业多阶段的融资需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是日本产业

^①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AIST & DBJ Venture 2050: A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Support Program”,https://www.dbj.jp/en/topics/case/html/aist_dbj_venture_2050_a_technology_commercialization_support_program.html, (2024 年 3 月 23 日访问)。

^② 产总研,「株式会社日本政策投資銀行 (DBJ) との連携を活かしたベンチャー創出の枠組みを創設」,https://www.aist.go.jp/aist_j/news/au20200706.html, (2024 年 3 月 23 日访问)。

^③ 株式会社日本經濟研究所,「イノベーション創造センターとは」,<https://www.jeri.or.jp/sctm/about/>, (2024 年 3 月 23 日访问)。

^④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Support for Innovation”,https://www.dbj.jp/en/service/advisory/tec_center/?sc=1, (2024 年 3 月 23 日访问)。

政策体系中关键的一环，具有自主性和高能力，且在制度框架中基于清晰的分工和政策协调，有助于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①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政府可以协调政策，实现政策协同。例如，联邦政府可能会提高环境法规的严格程度（大棒），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会同时提供新的补贴融资工具（胡萝卜）。这种体制性动态创造了政策协同效应，使经济能够更快地响应政策指令。^②

二是开发银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重点企业的发展，同时更大程度地调动社会资金和资源共同投入。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更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利用 ERP 风险投资基金工具，通过选定的德国和欧洲风险投资基金，间接投资于德国年轻的技术公司，使其不仅能够依靠风险投资基金市场的专业知识，并能更大程度地调动私募股权，引入私人投资。

三是开发银行善于通过提供专业知识或技术，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开发银行不同于商业银行，其具有行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专家，通过参与项目的开发、评估等各环节，有效引导相关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支持社会 5.0 战略实施的具体支持方式中除了为初创企业和战略性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或投资，还提供经营管理、并购、与政府联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支持。此外，还善于与相关专业机构合作，利用其在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对项目进行严格谨慎的评估后，支持项目的扩大再生产。

四是开发银行在融资及专业知识支持的基础上，还积极支持建设创新孵化平台、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等外围软硬设施。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更善于提供政策性的环境，如与其他研究机构合作建立创新支持和成果转化平台，与企业、政府、专家等保持对话，通过开放式创新来开发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解决方案；通过结合彼此的优势，支持和激励创建有可能对实现“5.0 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创新型企。

基于德国和日本的实践经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策略与改进方向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在推动重点业务领域和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方面，银行不仅要有针对性地投放资金，更要注重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政策间的协调统一。银行在规划和实施各项业务时，需要全面考虑自身的资本实力、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各类政策导向，确保各项业务与国家政策目标相一致。同时，银行还需积极构建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框架，不仅有助于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性，还需确保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实现银行与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① Go Shimada,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Japan’s Institution for Industrial Policy: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Bank, Private Sector, and Labor”, in Akbar No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eds., *Efficiency, Finance, and Varieties of Industrial Policy—Guiding Resources,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for Sustained Grow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56–190.

^② Ulf Moslener Matthias Thiemann, and Peter Volberd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as Active Financiers: The Case of KfW”, in Stephany Griffith-Jones, and José Antonio Ocampo eds., *The Futur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63–85.

其次，国家开发银行应善于发挥其在培育市场方面的独特作用。在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银行可以通过提供融资支持，直接助力企业成长。同时，银行还可以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作为技术专家为行业重点企业提供指导，帮助这些企业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快速发展。此外，国开行还可与其他机构合作建立创新孵化和成果转化平台，推动重要产业的科技创新。这样不仅有助于市场的快速形成，还能够提升行业或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国家开发银行需要适时调整其支持方式，可以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如提供贷款担保、参与债券发行等，引导更多私人资本投入市场。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同时，银行还可以通过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构建多元化的融资体系，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重要桥梁，国家开发银行应积极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为政府提供专业化的建议和意见。通过促进政府部门与企业代表之间的有效沟通，国开行可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更有效促进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能帮助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通过与政策和监管部门的紧密合作，国家开发银行可以确保自身业务发展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形成合力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国家开发银行在推动国家产业发展、培育市场、促进经济部门发展以及鼓励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开行应继续深化内部改革、优化业务结构、提升服务质量，以更好地支持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国开行还应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政策需求。

民国时期佛教复兴运动与日本密教回传

——以持松法师东渡求法为例

金 海

内容提要 持松法师是近现代中国弘扬佛教密法的核心代表人物,他在上海创立了被称为“沪密”的华严、真言相融合的密法宗派。本文着重考察民国时期持松法师东渡日本求学密法的经历,以及日本密教回传对中国密法复兴的影响。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界掀起了一场向日本求法的热潮,太虚等佛教大师多次带团访学日本,虽时常受到时局的影响,但中国僧侣仍与日本佛教界展开了深入地交流。持松法师则是佛教密宗流派东渡求法的代表人物,他自1923年至1936年间先后三次访问日本,深入学习古义、新义真言宗不仅学得丰厚的密法知识,获得阿阇黎位,同时带回了大量的密教典籍与法器,但是他在教义上,又不拘泥于日本真言宗的密法传统,反而强调华严思想与密教的结合,倡导显密圆融,为中国密教复兴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持松 密教回传 唐密 显密圆融 东渡求法

作者简介: 金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哈佛大学神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民国时期的佛教复兴运动在中国的宗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场运动具有“人间佛教”^①的思想特征,表现出佛教生活化、社会化、入世化、都市化、国际化等特色,同时也坚守了佛教神圣性与世俗性兼容合一的面向。其中佛教密宗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民国时期中国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藏密传播和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东密传播的二分的密教弘法格局。上海是都市佛教发展的典范区域,静安寺也成为民国时期以密教弘法为特色的核心道场。1947年,静安寺改制,成为十方丛林,改制后的静安寺^②首任住持持松法师也是近现代中

① 所谓人间佛教源于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太虚大师于民国初年提出的人生佛教,为青年太虚轰动一时的“三佛革命”口号中“教理革命”(初称“学理革命”)的主题词。太虚以“人生佛教”为题,陆续发表过一系列讲演、文章,以1928年5月在上海俭德储蓄会所讲《人生的佛学》阐述人生佛教之意趣最为系统。1933年10月,太虚在汉口市商会作《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讲演,反响强烈。“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大旨略同,其区别主要在人生佛教重在从个人信仰的角度著眼,人间佛教则重在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著眼。1934年,由太虚大师创办的国内最佳佛刊《海潮音》特出“人间佛教号”专刊,发表了有关人间佛教的文章十八篇,作者皆为当时僧俗中的俊彦如大醒、竺摩、岫庐等。人间佛教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一股新思潮,获得不少佛教徒和社会人士的赞同。参考陈兵:《正法重辉的曙光: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载《普门学报》,2001年1月,第2页。

② 有关静安寺的十方丛林改制问题,参见上海市佛教分会:《上海静安寺十方丛林改制之经过》,载《学僧天地》,1948年第2期,第27—28页。

国弘扬密法的核心人物。他精研华严，承接临济禅宗法脉，通晓天台、法相唯识、净土和律宗等显教诸宗大乘教义，三渡日本求学密法，把日本古义、新义真言宗以及台密法脉回传汉地。持松法师在融合日本密教与汉地华严密法的基础上，创建了被学界称之为“沪密”的新型的佛教宗派。

从教义内容上来看，“沪密”续接了印度原始佛教的传统渊源，继承了唐密祖师“开元三大士”所传密教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又在近现代进行了顺应地域和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创新发展。“沪密”的教义内容和佛教其它诸宗派有着非常复杂的交叉、融合关系，体现在密宗和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宗派之间多层次的互融、互立关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佛教弘法格局。持松以上海静安寺为核心道场弘扬密法数十年，同时结合上海地域和社会文化特点，创造出具有现代化和全球化属性的弘法特色，也体现出“沪密”神圣性和世俗性兼容的特点。目前关于持松法师的研究文献主要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持松法师的付法弟子杨毓华居士的著作，包括其编纂的《持松大师全集》八册，《持松法师论著选集》等。^①第二类文献主要是围绕持松生平及其判教思想展开的文章，此类专题研究数量较少，其中包括持松法师诞辰 90、95、100 周年的纪念论文集等。^②第三类论文则是在论述中国近现代密宗发展情况时提及持松的专著和论文，此类文献较多，但是有关持松的信息有限，大多一笔带过，未作系统性深究。^③在有关持松法师东渡求法的研究中，韩金科对比了持松与其他东渡僧人如大勇、显荫和谈玄的人生经历和弘扬密宗的情况，指出“在诸多取法回国者中，称持松是最完备者，并不为过，且其寿命达虚龄 80 岁，1972 年圆寂，这为他归国宏传密教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文章进一步总结了持松的学法特点及意义：“持松学法，并不限于一流一派，而是融会各家各流。他不仅获得了东密古义、新义的三个法位，而且还专门到台密根本道场修习仪轨，不以得其法位为目的，而是重在体验、融合，而恰是这种不拘流派的做法，才使取回的密藏在中土传承下去，使得唐密得以复兴。”^④但总体而言，对于持松法师东渡求法历程的系统性研究仍未得见，本文希望梳理清晰持松法师三度东渡求法的具体历程，考察民国时期日本密教回传对于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密教的影响。

^① 杨毓华主编：《持松大师全集》，新北：震曜出版社，2013 年；持松：《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② 游有维：《持松法师生平事略》，载《名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年；宽旭主编：《首届大兴善寺唐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源远流长—唐代密宗的渊源与传承）第一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 年；释真禅主编：《持松法师纪念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③ 这一类文献包括金山穆韶：「支那に於ける密教の現状」载『弘法大师の信仰观』，和歌山县：高野山大学出版部，1944 年；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秦萌：《民国时期真言宗回传中的显密之争》，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年；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五代至近代密教的流传》，新北：空庭书苑，2011 年。

^④ 韩金科：《持松对长安密教的传承与弘扬》，2011 年，<https://www.shanxifojiao.com.cn/index.php?m=home&c=View&a=index&aid=563>（访问时间 2023 年 5 月 30 日）。

一、清末民初的东渡求法热潮

佛教中的密教自唐代由最澄和空海两位大师传入日本后，以真言宗的东密和天台宗的台密为中心发展出各自独特的密教传统，并在不间断的情况下，法脉一直传承至明治维新之后。如唐代一大批学问僧跟随遣唐使至中国求法，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也掀起了一波东渡求法，佛教回传的热潮。^①

近代中国佛教向日本求法，可溯源至近代佛教复兴运动启蒙人物杨文会和日本学者南条文雄的交往，杨文会在日本寻回多种国内已经消失的隋唐佛典注疏，并在“金陵刻经处”刻印。杨文会等清末民初中国佛教者感受到了佛教的衰落，认为中国佛教有末法时代之象，中国佛教一方面面临着西学传入的危机，另一方面在物质上又有庙产兴学之忧。1890年后，庙产兴学作为清廷改革政策的一部分，将原有的佛道寺庙改建成学堂，张之洞在其有名的《劝学篇》中曾言“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义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②张之洞亦用末法时代之说将庙产兴学正当化。同时近代中国佛教堕落也并非仅在外来危机层面，僧人佛学素养的降低也是其表现之一。杨文会在1899年南京的日本东本愿寺派别院发表演讲，直截了当地指出：“本朝初年。禅宗鼎盛……近世以来，僧侶安于古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近时僧中有负盛名而未达佛意。竟作人天师表。受徒千百供养礼拜。敬之如佛而所开导于人者。实未能施对证之乐也。”^③在此背景下，中国佛教的改革派人士开始兴起东渡日本求法的潮流，并将佛教兴衰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太虚在1914年的书信中提到，“然欧美近代之文明，论者谓胚胎于十六世纪之宗教革命，而日本勃兴于实佛教为之原动力，故可以素称文物之邦，政治革命之际，独阒无宗教关系为历史之荣光乎？夫世界无宗教，惟佛教为万全之宗教。”^④

太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曾主张遴选三十岁以下受过具足清净戒德比丘五十人，集资送到日本学习密宗，研究显密融通，以五年为期。1917年9月，太虚自台湾赴日本，考察了神户、广岛、京都等地的诸多佛刹及佛教大学的制度，他“深觉《整理僧伽制度论》之分宗，颇

^① 在这一波热潮中，东渡的僧侶包括宗仰、月霞、太虚、弘一、慧刚、大勇、持松、显荫、大醒、纯密等，居士和学者有梁启超、章太炎、桂伯华、荻葆贤、程芝轩、程宅安、宋平子、夏曾佑、谢无量、丁福保、梅光羲、夏丐尊、丁桂樵、丁鸿图、欧阳竟无、韩清净、王弘愿、黎乙真、王一亭、范古农、吕澂、陈铭枢、吴璧华等。

^② 张之洞：《外篇》，载《劝学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0—42页。

^③ 杨文会：《与桂伯华书》，载《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卷），南京：金陵刻经处，1919年，第9页。

^④ 太虚：《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载《太虚大师全书》（第31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合于日本佛教之情况，而本原佛教以聊成一体，则犹胜一筹。乃于革新僧制之素志，弥增信念。”^① 1917年10月，太虚还专程考察了净土真宗的佛教大学、真言宗智积院大学。^② 1918年，太虚在上海和章太炎、蒋作宾共同发起创办《觉社丛书》，后改名为《海潮音》月刊。后得到王弘愿译文《密宗纲要》和《曼陀罗通释》，以及持松、显荫从日本学密回国后撰写的密教文章，大力提倡，广为宣传，推动中国密教复兴。

1910年代末显荫和持松都曾在谛闲改组的“观宗学社”僧教育机构学习。《海潮音》更刊行《密宗专号》，推广《密宗纲要》。^③ 作为1924年庐山大林寺暑期讲习班无心插柳的结果，^④ 1925年，在太虚的率领下，中华佛教代表团第二次访日。太虚参观了东京帝国大学、立正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黄檗山临济大学、高野山大学，还会晤了多位日本学者，如南条文雄、村上专精、大内青鸾、高楠顺次郎、铃木大拙、渡边海旭、常盘大定、木村泰贤、金山穆昭等。^⑤ 太虚对日本佛学教育、研究体系和成果进行了全方位的借鉴思考，太虚在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和闽南佛学院都使用了日本佛学教材并开设日语必修课程。直到九·一八事件以后，太虚停止了与日本佛教界的联系，转向藏传佛教同时继续佛教改革和显密圆融教义的探索，加强了对原始印度佛教义理的研究，开设梵文、巴利文研究的必修课。

就密教而言，杨文会的弟子桂伯华为近代第一位东渡日本学密求法居士。桂伯华在日本学真言宗，赴日本高野山，留学数年，得传法灌顶以归。^⑥ 桂伯华1910年东渡日本修习真言宗，求学期间与章太炎交好，可惜1915年即早逝于异国，所撰论著皆不存。^⑦ 1906年，桂伯华在东京发起迎请月霞讲经的活动。月霞抵达东京后，讲解《楞伽经》、《维摩经》、《圆觉经》等，章太炎、苏曼殊、孙少侯、刘申叔夫妇和蒯若木夫妇等参加听讲。^⑧ 其中章太炎曾于1906年在东京发表关于佛教的演说，其对佛教的理解得到了同在日本求法的宗仰法师（即乌目山僧）的认同：“华严所说，在普度众生，使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此乃物我同胞之真实境地，更无些子私意，为极端纯粹道德。而法相所说，则万物唯心，以一切有形色相，无形法尘，皆归于幻见幻想，空诸所有，此又背尘合觉之活泼境地，亦无些子渣滓，为极端清净道

^① 太虚：《东瀛采真录》，转引自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95页。

^②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61页。

^③ 《海潮音》创办之初曾发行《密宗专号》，并于初刊前两期提醒读者：“非先研究王弘愿居士所译之《密宗纲要》，则于本杂志之专号，将不得其研究之门径。为便研究密宗起见，本社今从王居士处取来《密宗纲要》多部，代为流通。”参见海潮音编辑部，《海潮音》，1920年9月第1卷第7期。

^④ 明杰：《从“中华佛教联合会”到“中国教会”——试析太虚大师建立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努力》，载《佛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25—39页。

^⑤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7页。

^⑥ 陈雪峰：《东密求法者的对立——以王弘愿和持松的论辩为例》，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4—59页。

^⑦ 王颂：《近代日本对中国佛教教育的影响——以杨仁山和太虚为中心》，载《佛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0—145页。

^⑧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德。”^① 沈潜在其文章《论释宗仰佛教革新的理论建树》对此评价说：“宗仰以华严、法相二宗为鹄，而后各具勇猛无畏之气概，正知正觉之心量，才能养成不谋私利的无我献身精神。”^② 他的评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思潮的方向。1921年，近代第一位东渡日本学密求法的僧人纯密（曼殊揭谛）因为其家世与王弘愿戚谊，受王弘愿鼓励东渡日本求学真言宗，得高野山宝寿院主高冈澄心大阿阇梨传授两部大法灌顶（1922）和天德院主金山穆韶大阿阇梨重授传法灌顶阿阇梨职位，兼授秘密灌顶并悉昙章、^③ 两部各尊仪轨等法（1923），1924年回潮州开元寺传法，后于1936年创苏悉地园道场传法。

1922年，太虚在武汉政商各界名流的鼎力支持下，创建了“武昌佛学院”这一现代化的佛学教育基地，在当时佛教界享有“黄埔”之誉，与佛教居士欧阳竟无在南京建立的“支那内学院”同为弘法重镇，培养大批佛教人才。1923年，太虚弟子大勇从日本学密归来，“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出家在家，都是唯密是尚的风气。”^④ 大勇在武昌佛学院传密法时，法尊、法舫、超一先从其学东密，后赴藏康学藏密。1924年，持松从日本回国传法，在武汉广泛受到欢迎。“（武昌佛学院）院董们更迷于印咒，借词经济不敷，不愿继续支持，几使武院关门大吉。”^⑤

当时，箕面胜尾寺佛学院主任中田觉船认为中国僧人研究日本密教热情高涨。^⑥ 大体上，在对汉传密教和东密研究的态度上分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如果不懂日语，那么日本的佛教自不必说，在中国绝迹而在日本发展起来的密教更是不可能恢复的。第二种认为，虽说是日本佛教，但佛教都是从中国输入过去的，所以不需要研究日语，或者说即使学了日语以后也没有用，所以也没有必要研究日本佛教。细分可以进一步为以下几派：

第一，曼殊法师一派。认为如果不懂数字就无法恢复密教，所以了解日语和日本僧侣的风俗习惯是从根本上了解密教法脉相承的路径。

第二，认为没有必要对日本了解得那么深入，但有必要对日语和日本文献了解一些。

第三，持松法师一派。认为不需要完全懂日语，因为输入到日本的佛教都是汉文书写的，所以只要能完整地看到用汉文书写的佛书就可以了。

① 乌目山僧：《论尊崇佛教为今日增进国民道德之切要》，载《佛学丛报》1913年第4期，1913年2月1日，引自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2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6年版，第12页。

② 沈潜：《论释宗仰佛教革新的理论建树》，载《法音》2011年第7期，第31—32页。

③ 悉昙指大约公元600至1200年间书写梵语使用的文字，是对笈多王朝时期使用的文字的改良，又称梵书、梵字，意为成就或完美。

④ 法尊：《著者入藏的经过》，载自吕铁钢、胡和平编：《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第359页。

⑤ 罗同兵：《太虚对“东密”的理性抉择：从密教对武昌佛学院的冲击说起》，载《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1—136页。

⑥ 「支那僧の日本仏教研究熱を充たすべく——支那全土に密教の大宣伝 真言宗徒の大奮發」，《中外日報》，京都：中外日報社，1926年3月5日。

中田觉船总结认为以上三派都愿意来日本学习。但是还有另外一派则是态度较为蛮横，连日本都不愿意去，认为只要研究每年从日本输入到中国的佛经文献就可以了。针对中国僧俗对日本密教研究的不同态度，中田觉船主张日本的佛学院应当采取开放主义的教育方针，而不是集中主义的策略。作为在中国宣传东密的急务，大阪法安寺了德院和高野山金刚峰寺捐赠了数万日元，并着手宣传工作，向中国捐赠了《大日经》、《大日经解题》、《即身成佛义》、《密教三学录》、《密教附法传》等。

二、持松法师的首次东渡

早在 1915 年 4 月，持松“在杭州华严大学肄业时”，听闻“日本有二十一条要求，并有来华传布佛教之说”，感到“不胜怀疑”，已产生东渡日本求学的想法：“我国千余年来，佛教虽迭有兴废，而大乘教理，绵延未绝。日本佛法，为中华之末流，有何特殊之点，转欲传布于我国？然其自明治维新后，或亦不无可采之点。尔时即欲往东，一探其究竟。奈时机未熟，殊失所期。”^① 1922 年 9 月 1 日，太虚法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持松法师应邀出席，并在佛学院讲授《观所缘缘论》，在此期间从太虚处了解到其弟子大勇准备再度赴日习密。大勇曾于 1921 年秋东渡求学，由于经费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业，后回国筹备川资。1922 年冬，大勇在杭州筹措旅费时与持松结识，鼓励持松一起结伴东渡。持松《自述》言：“杭地诸居士劝学密宗，余以此乃中国绝学，假此并可参观日本佛法之设施，遂慨然允诺。”^② 可见除了太虚、大勇的鼓励，还有居士界的劝引，一并促成了持松赴日学习东密之举。1923 年初，持松自行研读《法轮宝忏》，^③ 想先对密教形成初步的认识。但深觉瑜伽密义幽奥难解，更下定决心东渡日本，挽回千年绝学。于是毅然将兴福寺住持一职交予法弟惠宗，并于一月底启程，开始了复兴唐密的艰苦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持松大师年谱》指出，持松《自述》及诸多专家学者皆言持松“孤身东渡”求学。此外，持松在日本学法时的室友河野清晃长老^④ 亦称其“只身东渡”。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是第几次东渡，但根据相关资料可以反推出是第一次。

1922—1926 年间，赴日留学修习密宗的风潮在中国僧徒中流行开来，这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王弘愿译介日本密宗典籍关系甚密。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共有五号，当时袁世凯接受了一至四号条约，未接受最后一条，即“允许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也因此，日本传播佛教的企图引起了国人广泛的注意。中国僧俗对此大多持抨击态度，而诸如太虚、大勇、持松等僧人，乃至以王弘愿为代表的一些居士，却考虑到密宗在中国早已失传的现实，积极地想要学习了解东密，并将密教回传中国。在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杨

^① 釋東初：《唐密法脈之重返》，《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年版，第 412 頁。

^② 杨毓华：《持松大师年谱》，《持松大师全集》，台北：震曜出版社，2013 年版，第 6 页。

^③ 《法轮宝忏》全名为《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清代咫观记录成书，并撰有《法轮宝忏缘起》。

^④ 河野清晃（1906—2001），真言宗僧人，大正 6 年（1917）在高野山剃度，昭和 6 年（1931）从高野山大学毕业，昭和 15 年（1940）起任南都七大寺之一奈良大安寺住持，致力于复兴该寺。

仁山最早对密宗给予关注,他在制定释氏学堂数内班课程时,就将密宗设为一门独立的课程。^①早在1906年,杨文会的弟子桂伯华即东渡日本,但当时尚未学习密法;1910年桂伯华再次东渡,于高野山学习真言宗,可惜于1915年3月病逝于东京。^②

此后担负起复兴密宗任务的便是杨文会的另一位学生太虚。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局势下,文化交流变得异常敏感,据说1908年就有报刊谣传江南名僧敬安和尚(1851—1912)逃到日本并皈依了日本密教,这在当时引起社会哗然。敬安对此专门出面辟谣。^③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围绕“布教”一条更是纷争四起。如有日人宣称中土密宗早成绝学,而密宗自唐朝传入日本,至今仍极为发达,所以今之日本有必要反过来向中国传播密宗。国人陈某即针对此言论作《中国的阿弥陀佛》进行反驳,并于书中讲述日本密宗的教义。^④太虚读后,开始对密教问题留意起来。^⑤1918年,王弘愿将日本新义真言宗大僧正权田雷斧的著作《密宗纲要》^⑥译成中文,并在潮州士绅方养秋等的资助下,于1919年付潮州佛经流通处印行。太虚很快就注意到此书。在其支持下,王弘愿于1920年在《海潮音》上发表了数篇介绍密宗的文章,进一步拉开了近代密宗复兴的帷幕。太虚在是年发表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中即主张派人赴日本、西藏学密,复兴中国密宗。^⑦已有学者指出,太虚及其所创办的《海潮音》杂志是近代以来推动日本密宗回传中国最重要的力量。^⑧当时许多僧侣和居士对密宗产生兴趣即缘于《海潮音》的引介。^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持松虽欲东渡了解日本佛教现状,但“奈时机未熟”;此后数年,太虚等人对日本密宗的持续引介,实际上为纯密、大勇、持松、显荫等一批僧徒,乃至王弘愿、程宅安、顾净缘等一批居士赴日习密创造了成熟的时机。

持松初次东渡先至横滨,抵达东京后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语,然后辗转至和歌山县高野山天德院跟随住持金山穆昭学习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密法,得传法灌顶阿阇黎位。持松法

① 周继旨:《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6页。

② 于凌波:《民国高僧传初编》,台北:知书房,2005年版,第393页;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4页。

③ 作者与出处不详,参考黄英杰:《太虚大师的显密交流初探——以日本密宗为例》,载《玄奘佛学研究》2010年第14期,第135—163页。

④ 李郑龙:《近代佛教显密纷争的再探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74—85页。

⑤ 太虚:《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95—196页。

⑥ 有学者指出,《密宗纲要》是《密教纲要》之误,参考陈雪峰:《东密求法者的对立——以王弘愿和持松的论辩为例》,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4—59页。

⑦ 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载《海潮音》1925年第8期,1925年8月。

⑧ 何建明:《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浅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00—105页。

⑨ 陈永革:《民初显密关系论述评——以密教弘传浙江及其效应为视角》,载《普门学报》2004年第24期,第139—180页。

师跟随金山穆昭阿阇黎所受法脉乃是空海大师从长安传承而来的唐代密宗。^①在日本求学期间,持松得金山穆昭阿阇黎所藏《理趣经》古刻本以及数种近人所作注释,据此撰成《般若理趣经集解》一册,归国后于1928年印行。

此外,持松还与求学时同居一室的学僧河野清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惜久远。1993年,时任奈良大安寺住持已经96岁高龄的河野清晃长老,同日本十轮寺住持、真言宗大德藤本善光阿阇黎一道赴华,专程到上海静安寺参加持松大师百年诞辰纪念庆典,其情谊和法谊可见一斑。在1923年9月时,由于关东大地震,再加上经费即将耗尽,持松提前回国,传回了诸多真言宗经轨和祖师论著,其中包括《弘法大师全集》、相关传记、《大藏经》等,还有唐代流传至日本的各种佛教摹本和抄本,以及佛像图鉴、法器、法物,其中《大藏经》于归国后交予常熟兴福寺藏经楼供奉。林子青盛赞持松道:“佛教学生出国时都是带着中国佛教经典去的,只有持松法师是将中国失传之密教经典从国外带回来,这更是一种爱国爱教的表现。”^②其实,不只是持松,还有大勇及纯密法师也对密教回传做出了贡献。根据《高野山时报》1923年12月5日的记载:“本年十一月,大勇和持松二人完成了加行灌顶,因此,和纯密三人准备携手回国。十三日,金刚峰寺授予三人法具各一面,金山僧正授予他们十五条袈裟各一领。此外,以奈良长谷寺藏版为原型的两界曼荼罗有三双,分别是成福院、天德院、山口师捐赠的,三位法师也各受领了一双。十九日早上,三人辞别山门后从神户乘船回国。”^③据此可知,纯密、大勇与持松三人或许是千年来首度传回东密的中国人。

三、持松法师的二次东渡

1925年10月,持松再次东渡,作为“中华佛教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东京参加了东亚佛教大会,此后并未随代表团归国,而是留在日本继续学密。此次会议为世界佛教联合会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从一年多前就开始筹备了。1924年2月,《海潮音》刊载太虚、持松等法师撰写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呈请立案文稿》,此文由湖北督军萧耀南转呈北洋政府内务、外交两部,题为《湖北督军公署第2403号训令》,经萧耀南多次电请主管官署协调,终获会签核准。7月,世界佛教联合会于庐山召开第一次会议,参会代表主要来自中日佛教界,此次会议的成果之一即是商定明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会议——东亚佛教大会,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由筹组中的中华佛教联合会选定。随后,太虚和李开先担任筹组中的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总干事,

^① 韩金科:《持松对长安密教的传承与弘扬》,载自《长安佛教的历史演进与传播(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② 杨毓华:《持松大师年谱》,《持松大师全集》,台北:震曜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林子青(1910—2002),福建省漳州人。据《持松大师年谱》记载,林子青曾出家,法号慧云,先后任教于兴福寺法界学院(惠宗接任住持后所办,前身即持松在应慈的协助下创办的华严预备学校)、静安佛教学院等。

^③ 「支那留学僧の帰国」,载自『高野山时报』第319号,和歌山县:高野山时报社,1923年12月5日,第6页。

又设置北京筹备处,要求各省在9月前推选出二至八人出席筹备大会,并公布了已签定的各省名单,其中江苏、湖北两省都推选持松做代表。1925年4月13日,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大会在北京召开,经总筹备处干事反复与各地佛教团体协商,最终确定由太虚、道阶、持松、李荣祥等27名僧俗代表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①

10月28日,包括持松在内的大部分代表乘长崎丸号出发,在船上正式组成“中华佛教代表团”,并确定了各自的职务,其中太虚担任团长,持松负责代表团的文牍工作,撰写了《东亚佛教大会致辞》。11月1日,东亚佛教大会举行开幕式后,先推选大会的会长、副会长,再推选教义研究部、教育事业部、教育宣传部、社会事业部的理事各二人,计划在三天内分别展开研讨,持松被推选为教义研究部理事。^②他在报告中阐述了自己对佛教研究方法论的看法,认为“中日两国近时所醉心狂嗜之欧西哲学实为光扬佛化之障碍”,主张“研究佛教当用佛之方法研究之”,即“摧邪显正而已”。^③在会议期间,持松与日方代表进行了广泛地交流,同其深入交流的学者有南条文雄、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常盘大定、河口慧海等。从11月4日起,中华佛教代表团到东京、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神户等多地考察,在此期间,持松于东京帝国大学作演讲,题为《东亚人士对于欧美应尽之义务》,并于京都南禅寺作《京都南禅寺祭一山国师文》,立碑纪念元代东渡传法的一山禅师。到了高野山,经持松介绍,太虚与金山穆昭结识,金山穆昭作题为《弘法大师之佛教观》的演讲,太虚则以《金山教授之说与感想》为题作演讲回应。^④

代表团返回中国前夕,持松撰文以示感谢,之后他继续留在日本,准备进一步修习密宗。11月23日,持松回到东京,暂时寄居在某食品店,与店主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稍后,持松前往新潟县,跟随真言宗丰山派管长权田雷斧学习新义真言宗。^⑤权田雷斧曾学禅宗、净土宗,又得丰山真言宗、比叡山台密^⑥传法灌顶,不仅在教理上显密皆通,还精于佛像绘画艺术,代表作有《大日经须玄秘曲》、《密教纲要》、《佛像新集》、《密教奥义》、《法具便览》、《理趣经略诠》、《十八道私记》、《护摩私记》、《东海铁塔诸祖年谱略颂》、《兴教大师真实传》、《传法院流传授私勘》、《性相义学必须》、《说教能做因》、《曼荼罗通解》等。^⑦从学之后,持松对密宗教义以及佛教艺术、坛场与法器布供等认识都有所加深。修习至1926年春末,在权田雷斧的印可

^① 藤井草宣:『最近日支佛教の交渉』,东京:东方书院,1926年,第38页。

^② 陈长松:《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及其思想渊源》,载《法音》2014年第12期,第42-53页。

^③ 杨毓华:《持松大师年谱》、《持松大师全集》,台北:震曜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④ 梁明霞:《1920年代的中日佛教交流——以东亚佛教大会为中心的考察》,载《宗教文化》2015年第5期,第120-127页。

^⑤ 真言宗丰山派是日本真言宗的一派,属新义真言宗,总本山是奈良县樱井市长谷寺。日本真言宗自根本之小野、广泽二流开始,虽然衍生出众多流派,但中世以来大致分为新义、古义二派,在江户时代古义派多属高野山,新义派则隶属智山、丰山二山。

^⑥ 台密即天台宗系密教,乃密宗的一个派别,除两部大经外,并重《苏悉地经》。

^⑦ 田中海应:《丰山小史》,东京:杏林舍,1924年,第149页。

下,持松于多闻院道场入坛受金、胎两部大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第四十九世灌顶传法阿阇黎位。^①拜别权田雷斧后,持松又去到位于京都比睿山延历寺的台密根本道场,学习台密仪轨。由于持松早已通晓天台教义,又熟悉坛场各种如法威仪,所以很快就完成了台密仪轨的学习。此后,他再度前往高野山,跟随根本上师金山穆昭继续修习,受三宝院、安详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并补习梵文。经过进一步的修习,持松又得古义真言宗三宝院流第五十一世阿阇黎位,金山穆昭将正统密教法脉尽授持松。据《持松大师年谱》记载,金山穆昭待持松犹如慈父,不仅传授各种密教法本、法器,临别又将珍藏多年的两巨幅曼荼罗及唐密十二天画像赠予持松,这是穷尽日本祖孙三代画师毕生精力绘制的,精美至极,异常珍贵。持松归国时,金山穆昭甚至亲自送别持松至轮渡,情谊之深可见一斑。这或许是因为往昔唐密东传日本时的恩情。空海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到达长安后,拜入青龙寺惠果门下,得授胎藏、金刚两部大法,惠果也以两部曼陀罗及道具、法器相赠。空海弟子圆行入唐拜义真为师,在长安大兴善寺师从中天竺难陀学习,回国时青龙寺及密宗诸大德也以惠果遗物相赠,回日本后圆行创建了灵岩寺和播磨大山寺,弘扬唐密。^②所以,金山穆昭对持松回传东密于汉地抱有很大期许。

持松第二次赴日学习期间,对日本佛教的演化历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所撰《扶桑重游记》于1928年刊登于《海潮音》,记述了二次东渡的过程及观感。他特别注意到日本“神佛分离”的趋向:“佛教初入日本时,与日本固有神祇思想相冲突,惹起种种纷争。其后渐渐调和,两者全然混合,遂致‘神佛同体’‘本地垂迹’之思想深入于民众脑筋,全国一致的信仰皆归之,此种‘神佛同体’之思想发端于奈良朝时代,成熟于藤原时代,至镰仓时代,排斥外来文化,欲独树日本新标帜,遂至废佛毁释之说盛行一时。”在此文末,持松还结合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对日本“废佛毁释”的状况提出了批评:“昔吾国佛法初来时,黄老之术方盛,亦曾与佛教争论,然吾国传教始终未唱佛道混合论,即吾国最有威势之孔教,虽一二腐儒时起诋毁,而亦未尝将佛教与之混合,甚至儒道之流皆剽窃佛经以饰彼教,佛教终能以理胜之。然吾

^① 笔者2021年就持松自权田雷斧传承拜访请教上海市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席胡建宁居士。胡建宁幼时在上海得到持松的教导。他证实了持松得自权田雷斧的法脉传承。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第四十九世阿阇黎相承法脉为:大日——金萨——龙猛——龙智——金智——不空——惠果——弘法——真雅僧正——仁僧源都——本觉大师——禅定法皇——宽空僧正——宽朝大僧正——济信大僧正——入道二品亲王——成就院大僧正——兴教大师——兼海上人——隆海法印——觉寻僧都——贤誉阿阇黎——觉瑜法印——觉禅阿阇黎——经瑜法印——禅助大僧正——印玄上人——道渊大僧正——守融大僧正——觉果权僧正——庆深法印——仲盛法印——信严法印——宥盛法印——真性法印——菊渊阿阇黎——宥严权僧正——信遍前大僧正——孝源前大僧正——赖遍大僧正——秀瑜权僧正——宥证前大僧正——深仁亲王——禅证前大僧正——济观亲王——照道僧正——荣严大僧正——雷斧大僧正——密林共四十九世。

^② 宽旭:《让唐密文化大放异彩(代前言)》,载自宽旭主编:《首届大兴善寺唐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源远流长—唐代密宗的渊源与传承)(第一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0页。

国儒道之教理，远胜于彼神道之说，而犹能伏之，岂彼神道之流不可伏？在人而已！”^①持松结合第一次东渡，对日本佛教之优缺点做了总结。由此可见，他对邻国佛教现状的观察逐渐由表及里，深入到了文化交锋的层面。

四、持松法师的第三次东渡

1936年春季，持松第三次东渡，和汪书诚^②居士一道赴日采购密宗法器以备重建真言宗道场之用，并周游日本列岛，考察各地佛教发展情况。持松担任武汉洪山宝通寺住持期间，曾设孔雀明王坛祈雨成功，当地不少名流由此信奉密宗，成为了持松的灌顶弟子，汪书诚即是其中之一。据《持松大师年谱》载，自从皈依持松起，汪书诚一直护持持松，为唐密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4月30日，持松偕汪书诚参访高野山，专程去到曾两度求法的天德院处，此时金山穆昭任宝寿院门主、修道院长。参访期间的某天夜里，持松于半睡半醒之际见宏大庄严之坛场璀璨光明，整齐地陈列着香花灯涂及种种阙伽，金山穆昭于坛中对持松微笑着说道：“汝终年弘法利生，显密双修，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并悟证金胎不二，定慧即一。今与汝授记，将来成佛，号曰‘松华如来’。今请汝本尊不动如来为汝作大灌顶，海会众圣付嘱证明。汝将来有金刚力士、部母、众位菩萨辅佐……”话音甫落，不动明王及诸圣众从云间幡盖降临金山穆昭头顶上方，从诸莲华座中流出甘露，化作光明，照于其身。本尊上师劝勉持松“百尺竿头，不断向上”。持松顶礼感谢佛恩加被与授记，遂发大誓愿曰：“松华如来发愿于南方庄严满月世界作为依报，以十种大愿摄引众生，上报下化，永无穷尽。”当此之时，天花四飞，天乐妙舞，欢喜无限。持松醒来发现自己仍坐在原榻，万分感念根本上师金山穆昭为其授记、付嘱，请不动明王及众圣灌顶、证明，不禁泪如泉涌，伏地扣送，礼谢不已。^③此事见诸持松晚年撰写的《松华如来密行修证了义经》、《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等中，文稿交由俗家弟子杨毓华（法号超晔）保存，后收录于《持松大师全集》。这一次持松在日本停留的时间不过月余，很快便归国了。

持松年仅三十三岁就已习得东密古义、新义与台密，兼受金刚界、胎藏界二部大法，三个灌顶传法阿阇黎位加身，习密成果斐然。吴立民在其为《持松大师全集》所作序中认为持松是近代唐密复兴中所作贡献“最突出者”，“唐密复兴，可为中国大乘各宗开辟解行相应的瑜伽道路，又为各宗不二法门打下圆融会通的真实基础，实乃新世纪中国佛教之大事要事。有鉴于唐密复兴法运之重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密乘大德，无不为之努力，其中最突出者，

① 持松：《扶桑重游记》，载《海潮音》1928年第4期，第8—14页；《扶桑重游记》（续），载《海潮音》1928年第5期，第5—9页。

② 汪书诚名岁鸾，湖北武昌人，清末举人，历任山西大学堂教习、广东优级师范管理员兼教员、广东学务公所专门科长等。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7年任广州非常国会众议院议员，并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参议。随后投身实业，曾任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董事长、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主席等职。

③ 杨毓华：《持松法师——挽回千年绝学》，陕西汉传佛教宗派历史文库，https://www.sxlib.org.cn/dfzy/sxfjwhzybk/sxhcfjzplswh/lsgd/201701/t20170122_614373.html#fjpage_link01a（访问时间：2023年12月1日）

当推持松法师。”近代先后东渡学密的僧侣有纯密、大勇、持松、显荫、谈玄、曼殊揭谛、又应、默禅、慧刚、海印、悟光等,以及桂伯华、王弘愿、程宅安、顾净缘、江味农、陈济博、黄邦辉等居士。^① 太虚认为“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② 三人主要跟随金山穆昭学习古义真言宗,可惜显荫和大勇逝世极早。^③ 随后奉太虚之命再次东渡的谈玄亦兼习东密、台密,并得两系灌顶传法阿阇黎位,带回两千多种密宗典籍以及大量密宗法器,但回国不久又因病早逝。^④ 这样一来,复兴密宗的重任实际上长期由持松担负。结合上述情况,更能理解持松在睡梦间受到金山穆昭上师的劝勉和付嘱时悲喜交集的心境。

五、持松东渡对民国密教复兴之意义

民国时期的密教复兴现象可以看作是从日本引进的以宗派为中心的佛教史观所带来影响的直接产物。^⑤ 但是密教复兴虽然受到日本的影响,但它既不是在日本真言宗指导下进行的运动,也不是步调统一的运动。持松法师对于空海的“十住心论”的反思和重新阐释,既是其在日本学习真言的直接成果,同时也构筑了其在教义学上对以华严融入唐密,实现显密圆融的理论依据,产生了新型的“沪密”密法流派。

持松在高野山修行结束回国后开始了密教的布教活动。他主张密教是大乘佛教整体的一部分,并在《海潮音》上发表了《贤密教衡》一文,阐述了密教与华严思想的融合,倡导密教教徒不仅要学习密教,还要广泛学习大乘佛教知识。^⑥ 他的观点遭到了同在日本接受真言宗传承的王弘愿居士的反对。王弘愿认为华严思想从“理”部(教义)上看属于密教的范畴,但没有强调“事”部(密教的实践)。对此,王弘愿批判持松是没有“墨守”祖师空海教义的无礼者。持松对此反驳认为,《华严经》中也有密教的“事”部实践(手印),认为王弘愿是过分宣扬密教“十住心论”相对于诸大乘显教思想的优越性,并批判了其排他性。持松认为王弘愿的态度违背了唐代密教祖师的本意,实为“不孝”。持松主张华严和密教是“互助、互补”关系,认为两者

^① 邓子美、王佳:《唐密在近代中国》,载自宽旭主编:《首届大兴善寺唐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源远流长 - 唐代密宗的渊源与传承)(第一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 年,第 55–60 页。

^②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621 页。

^③ 陈雪峰:《东密求法者的对立—以王弘愿和持松的论辩为例》,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第 54–59 页。

^④ 肖平:《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14–216 页。

^⑤ エリック・シッケタンツ:『墮落と復興の近代中国仏教: 日本仏教との邂逅とその歴史像の構築』、京都: 法藏館, 2016 年, 第 331–333 页。

^⑥ 此处的“贤”是指贤首华严宗,“密”则是指真言宗。持松:《贤密教衡》,载《海潮音》1928 年第 6 期,第 31–42 页。

平等,没有“君臣佐使”之差。持松认为王弘愿的立场只是没有正确地理解大乘佛教而已,只不过是“十住心论”的“党见(偏见)”之说。华严经和其它密教经典教义同质一体,讲述了法界三昧地,主张从密教、华严融合的立场出发批判日本的真言密教。持松认为:“亦吾之所以尊师尊祖之所宗者、令去其十住心教之小疵、而返成其真言密教之良规。”对持松来说,空海的“十住心论”是王弘愿的谬见源头,只是王弘愿为了维护从日本传入的真言密教的合法有效性,而不得不妥协地否定其它大乘经典中涉及密教的相关内容。

赴日之前,持松和其华严传承的师门已经具有深厚的华严佛学功底。月霞法师弘扬《华严经》,在上海创建华严大学,培养专弘华严的僧才。应慈随其后,宣讲《华严经》,曾创立华严学院、华严速成师范学院等,重编《华严经疏钞》,号华严座主。之后常惺、持松也弘扬《华严经》,常惺撰《贤首概论》,持松撰《华严宗教义始末记》。从日本回国之后,持松对日本密教空海倡导的“十住心论”等教义抱有疑问,并试图回到密教的“原始”教义来解释密教。换言之,持松希望回溯到存在于日本密教之前那个原初密教(“吾欲合乎真言原初之义”)中所涉及“十住心论”的概念。但是在密教的两位祖师龙树和龙猛以及中国密教诸师祖的思想中并没有发现相关论述。因此持松怀疑“十住心论”与“原初”的密教思想相悖。持松对日本密教怀疑的初衷是希望摆脱日本密教的负面影响和非正统的内容,而重建原初的唐密传统。对于空海“即身成佛”的论述,在当时持松也采取了相对批判的立场,认为空海的密教思想不能完全照搬适用于中国佛教。

显密(华严)之争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文化运动中的核心问题,持松和王弘愿关于教义的论辩承接了此前太虚等人和王弘愿关于居士传法问题的争执。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辩双方及其支持者其实难以把目光纯粹聚焦在教理辨析上。所以,陈雪峰不无遗憾地总结这场密教之争相似于当时唯识法相学的争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理的歧义。这个结果也是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但持松和王弘愿的论辩至少将显密之争从佛教戒律推进到了教义研究层面,具有里程碑意义。^①而有关教义的比较,陈永革认为持松似更胜一筹。持松论密的优势表现为,他熟悉掌握显密经论,并始终围绕华严宗学派对真言宗加以阐释圆融。相比较民国初期引入汉地的其他日本真言宗著作,持松开创了显密对话的义理互摄。这种以华严判教摄取东密的识见回现了辽代道寂《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和辽代觉苑《大日经义诀演密钞》以华严解释密理的方法论,此为民国时期密宗研究的一大进步。^②印光曾多次以显荫学密后早逝及王弘愿学密后致病等为例,对密宗的现身成佛说进行批判,认为密法与其他法门相隔多碍,唯法身大士能修此宗,并从中得益,根器中、下者应当修习显教,若执意修习密宗不仅很难获益,还可能自毁身心。将显荫的早逝及王弘愿的患病归咎于习密固然值得商榷,但印

^① 陈雪峰:《东密求法者的对立——以王弘愿和持松的论辩为例》,《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1期,2018年1月,第54—59页。

^② 陈永革:《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民国浙江佛教研究(1912—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00—319页。

光此说提醒我们,要达到显密圆融的境界离不开极其深厚的佛学修为,由此更能理解持松以华严摄密之重大意义。^①

六、总 结

民国时期的密教复兴运动,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持松法师通过三次东渡日本求法,深入学习了古义、新义真言宗和台密法脉,带回了大量密教典籍和法器,并以上海静安寺为主要道场,创立了被学界称为“沪密”的新型佛教密法传统。持松法师不仅在教义上强调以华严入唐密的“显密圆融”思想,他还在学习过程中吸收了真言宗的密教传统,不生搬硬套,而是发展创新,以使密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环境相适应。持松如同华严密法的伏藏取者,他所开发的“沪密”宗派是在民国时期佛教复兴文化运动背景下产生的,其佛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华严密法特色,沪密带有独特地域和社会文化的入世特色。持松从“人间佛教”的现实缘起中倡导积极入世是其佛学思想的研究倾向所决定的,其佛学理论和成果的深刻现实意义是不容否定和忽视的。沪密理论在“人间佛教”弘法中倡导了现代化和全球化思想,持松所关注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型转化的问题是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探索,也秉承了当时社会中精英知识分子如吕激提倡的积极入世的“佛法与世间”的大乘菩萨行精神,是对“空谈性命,无补人群”的消极思想的批判。持松以佛学思想来适应当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人文关怀,尝试现代价值转换来扩大“人间佛教”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他倡导的密教复兴文化运动可以被认作是一个近现代社会“多元通和”的典型案例,极大丰富了太虚“人间佛教”的理论内涵,更加清晰明确了中国化佛教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应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持松法师的东渡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密教复兴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运动虽受日本密教影响,但持松法师等人的努力使之成为了中国佛教自身发展的一部分,展现了中国佛教在面对现代化挑战时的创新与活力。持松法师的实践不仅是对传统密教的传承,更是对密教在现代社会中角色和意义的重新诠释,对于理解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① 秋爽主编:《寒山寺佛学》(第八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47页。

“慰安妇”研究的问题与进展

——访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

苏智良 李 雯

内容提要 在日本对外殖民和侵略的过程中,军方曾强迫中国大陆、日本割占的台湾以及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地妇女和少数白人妇女充当“慰安妇”,向日军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该问题作为历史问题关系到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同时也影响到当前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的建构。苏智良教授作为中国最早致力于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者,积极发掘“慰安妇”相关资料,联合有良知的学者积极与日本政府否定“慰安妇”的行为进行斗争,此外他还积极投身于中国“慰安妇”证言收集以及对她们的生活进行关怀等工作。针对近一段时期“慰安妇”研究的问题与进展,我们对苏智良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

关键词 苏智良 “慰安妇”问题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李 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李雯(以下称“李”):请问您最初是出于什么动机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呢?

苏智良(以下称“苏”):我其实主要从事上海城市史和抗战史研究,抗战史自研究生阶段起便已开始涉足。1991年,我有幸获得公派机会,前往东京大学进行交流学习,由于我是副教授,故获得外国人研究员的待遇。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中国毒品史,后来也出版了相关著作。在访学期间,我有幸多次参加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会议。正是在这些会议中,我首次接触到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相关讨论。那是1992年——“慰安妇”问题出现的第二年。自1991年8月14日金学顺女士勇敢站出来之后,这一问题迅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包括我国的《人民日报》等世界各大报刊及主流媒体纷纷报道。

在一次与日本学者的闲聊中,对方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或许对“慰安妇”问题有所了解,因为他所知的首个慰安所便设立于上海。这一信息令我深感震惊,因为我对此段历史并不了解。于是,我决心开始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1993年,我返回上海后,便立即着手对两处地点进行实地调查:一处是位于复旦大学往东的翔殷路附近的东沈家宅;另一处则是东宝兴路大一沙龙慰安所。根据军医麻生彻男的回忆和照片,,对相关地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复原了杨家宅慰安所的历史。随后,我又对上海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慰安所——大一沙龙进行了深入调查。在完成东宝兴路的考证后,我发现上海地区的慰安所数量远不止两处,于是我开始逐步扩大研究范围。然而,我未曾预料到的是,这一研究竟会持续长达三十余年。最初,我们对这一课题的规模和深度都缺乏足够的认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这一课题是十分庞大的,而且在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李:您方才提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并未深入研究或关注该问题,这无疑会牵涉到历史记忆这一重要层面。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已有众多幸存者及受害者相继离世。鉴于此,您如何看待由此引发的记忆分化现象?

苏: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我便将主要精力投身于“慰安妇”研究,因为这就是在与时间赛跑。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蛮了不起的。何以言之?韩国举国家之力,确认的幸存“慰安妇”仅为 239 人,然而在中国各地,我们发现的受害者数量已超过 340 人。这足以证明,在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数量之众多。然而,遗憾的是,政府并未积极倡导和号召大家去讲述这段历史,导致许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如今,这 340 人中仅剩下 8 位幸存者。

尽管如此,我们仍致力于记录她们的历史。但口述历史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在访谈一位 85 岁的幸存者时,问她受害的具体年份,这个问题是绝对没有答案的。我们在访谈时,通常是通过了解她的属相、年龄和受害季节等信息,来辅助确认其陈述的真实性,比如会问她当时小麦的长势如何等等。受害者李秀梅的这段记忆很清晰,因为受害时正值她新婚之际。这种具体的记忆为我们提供了很宝贵的线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老人在不同时间的陈述可能存在差异,对此我们也予以理解,但绝对不能是虚构的经历。为了确保访谈内容的真实性,我们会通过询问受害者是否有其他共同受害者,以获取多重的证言。虽然是口述史,但我们的研究遵循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会通过拍摄、照片、录音等多种方式保留证据,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李:在研究“慰安妇”课题的过程中,您是否曾遭遇来自日本政府的反对意见或面临阻力?中国政府是否向您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支持或协助?

苏:我的答案与你的想法有些出入。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并不倾向于我们公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某些罪行,如“慰安妇”问题和民间索赔。我曾被告知,我的研究可能会给中日关系添麻烦。在 1995 年之前,政府并不希望我公开发表相关调查结果。所以我最初所承受的压力并非来自日本政府,而是源于我国政府的担忧。当然,当时政府的有关部门是很短视的,所以我自己一直在坚持做调查研究。大概三年后,当外交部与日本就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性、“慰安妇”问题的性质以及钓鱼岛的主权归属等三个核心问题进行谈判时,外交部主动找到了我。当时,日本谈判方主要由一些右翼社团代表组成,他们在谈判初期均表示自己并不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但到谈判后期,他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呈现的是很细致的研究成果和证据,外交部的负责人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之后,对“慰安妇”的研究才得以顺利推进。

日本政府自然更是非常暧昧，当我们设置中韩“慰安妇”少女像时，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赤裸裸地反对，安倍内阁时就叫嚣要修改承认“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

李：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具有多重性。官方的压力固然存在，但民间的困难亦不容忽视，甚至可能更为复杂多样。特别是在我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道德观念的束缚尤为沉重。所以在调查过程中，有遇到令您印象深刻的阻力或困难吗？这些阻力又是如何影响您的研究进程的呢？

苏：我们最开始调查的上海江湾地区的受害者，至今尚未获得明确的调查结果。因为很多人是不愿意公开站出来的，我们也会承诺对受害者生前的肖像与故事保密。当然，也有很多勇敢的人愿意分享她们的经历，她们会觉得故事讲出来后心气就顺了，也愿意向我们讲述她们的故事。所以这个只能尊重受害者本人的意愿，当然，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晓之以理。

两周前，我的太太陈丽菲教授和我们学校两名研究生及一位大阪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一同前往广东湛江拜访一位 94 岁高龄的国民党抗战老兵。这位老兵有被日军囚禁的经历，所以我们怀疑她可能是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之一。陈老师了解情况后，判断她应该就是受害者，毕竟我们已经有几百人的访谈经验。但老太太坚决否认，说没有这回事。最后我们肯定会尊重她的意愿，不会继续向下调查。像这样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面临着各方面的阻力。在 2000 年，我们曾计划带领几位受害者前往东京参加一个民间法庭的听证会。但是云南和海南的几位受害者却因护照办理受阻而无法到场。相关管理部门以“你们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再去外国讲述会丢人”为由，拒绝为她们办理护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深感无奈，只能寻求其他方式表达她们的声音。志愿者们协助她们绣品，代表她们的立场，带到会场展示。

李：根据之前的新闻报道，今年 2 月份，志愿者们前往长沙参加沈建梅老人的葬礼期间，发现了一位新的受害者。志愿者们是怎样找到这位受害者的？

苏：这位受害者，我们等待她至少有六年了。这是涉及姐妹俩受害的案例，其中一位受害者很早就向我们透露了相关情况，然而这位老人却始终否认。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她虽声称知晓相关事实，但坚称自己并非受害者。直至最近一次赴湖南开展工作，她才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受害经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更是对受害者意愿的尊重。

其实类似于湖南这样的受害者，与日本研究者所定义的“经典慰安妇”是有差异的。部分日本研究者过于拘泥于“本本主义”，认为只有具备花名册证明、在慰安所接受过日军军医体检的女性才能被定义为“慰安妇”。但是实际情况是，有大量被日军抓至破庙、仓库等地方进行人身控制的中国妇女，她们同样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但却不能被算是“慰安妇”。针对这个问题，我做了多年努力，希望改变他们的错误认知，现在至少成功说服了许多韩国人改变原有的观念。因为我找到了好几位具有类似经历的朝鲜“慰安妇”作证。我们认为，“慰安妇”本质上就是日军的性奴隶，在战争状态下，日军的暴行极可能以多种形式发生变异。这包括但不限于日本政府所允许的所谓“合法慰安所”，更包括军队自行创设的其他形式。日本本国

的“慰安妇”怎么可能送到湖南前线呢？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直接在湖南就地强征。我们在湖南地区发现的 20 多名受害者，均是在长沙战役、常德战役、豫湘桂战役等关键时期被日军强行征召的。这一发现主要得益于陈丽菲教授和学生团队的不懈努力。她们经过二三十次的探访与核实，才最终确认了这些受害者的身份。

李：纪录片《二十二》^① 虽然在国内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但是并没有走出国门。而类似的关于屠杀犹太人历史的影片却有极大的国际商场，比如《辛德勒的名单》，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改善呢？

苏：《辛德勒的名单》这部影片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我国确实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二十二》的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还是由我所在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向国家电影局申请才最终获得批准的。至于影片进入院线的资金，也是以我的名义发起众筹所得到的。尽管目前情况正在慢慢改善，但《二十二》的放映仍仅限于在中国境内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一次启蒙，与《鬼乡》^② 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相比，我们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我们迫切期待能够出现一位如斯皮尔伯格般的杰出导演，在未来创作出能够引起全球共鸣的同类题材影片。

李：大众认识韦绍兰和罗善学，主要是因为纪录片《三十二》，^③ 从您的角度，您觉得他们二位的故事有怎样独特的价值？

苏：在日军这样一种性奴隶制度下，必然会产生很多混血儿。在殖民地和占领区，有些强暴的日本兵是不允许外国的“慰安妇”生育的，但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各有差异。以山西盂县的曹黑毛老人为例，她曾两次怀孕。第一次，她将孩子托付给自己的母亲；第二次，在慰安所内被迫生育，最终是夭折了。老人回家后，她的母亲告诉她孩子被喂狼了，她妈妈无法面对女儿遭受日军暴行后所生的孩子，她认为这个孩子就是个孽种。我们不能指责曹黑毛的母亲没有人性，真相如何，我们都心知肚明。

我们一直在找这一类受害者，虽曾找到些许线索，但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直至 2006 年至 2007 年间，韦绍兰和罗善学勇敢地站了出来。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其难得的案例。2010 年，我们资助他们前往东京，名义上罗善学希望到日本寻找生父，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媒体态度的一次试探。然而，时过境迁，与我们留学的时代相比，社会环境已

^① [《二十二》是 2017 年郭柯执导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的状态为背景，重点选取毛银梅、林爱兰、李美金、李爱连四位老人为代表，通过这四位老人和相关人员的口述，纪录“慰安妇”老人的生活现状。电影于 2014 年开始拍摄，2017 年 8 月 14 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中国上映。电影开始拍摄时，中国大陆仅有 22 名公开身份的受害者在世，电影因此得名。]

^② 《鬼乡》(Spirits' Homecoming)（又名归乡）是 2016 年由导演赵正莱制作的一部韩国纪录片。该片以韩国慰安妇为原型，描述了 1943 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占领时期，14 岁少女正敏和 16 岁的英熙以及一群年龄相仿的女孩们被日军强行带走后成为随军慰安妇的悲惨遭遇。

^③ 《三十二》是一部由郭柯导演，陈伟雄、陈妍希、Lucas Oliver Frost 制作的一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纪录片，重点讲述了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韦绍兰老人和她的中日混血儿子罗善学的故事。

大不相同了,日本民众观点已经被洗脑了,中日关系也不复从前了。90年代初,参加民间法庭审判活动尚需付费,但仍有高达1400人次积极参与旁听。相较之下,今天情形已然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把这一变化记录下来。我也曾跟陈老师讲,若有时间,我们当为这对母子写一本书。连续三年,每逢年初三左右,我与陈老师便会前往广西荔浦,购买新被褥,与他们一起生活,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并详细记录。然而,由于工作繁忙,至今尚未完成此著作。

李:关于您提及的写书事宜,获悉您计划在2025年出版一本约100多万字的书来比较完整地反映这段历史,可以向您简单地了解一下相关内容吗?

苏:我与陈老师将这本书作为我们“慰安妇”研究的一个句号。初稿早已完成,我们一直在对其进行修改。前两日,第二册已顺利交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目前,陈老师正忙于第三册的校对工作。因为她过去是出版社的编审,能够以一个独特的编辑的眼光来吹毛求疵,从而让我们这本书更加严谨。同时,我也还在查找一些东南亚相关资料的准确出处,由于90年代初期的学术环境相对宽松,许多资料的来源信息都较为模糊,所以我们还在不断补充和完善。我想,我们这本书的出版应该能够改善这方面的问题。目前,我们已有十种关于“慰安妇”题材的著作在海外成功出版。在未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举足轻重的证据,如我先前所提及的定量研究、“慰安妇”名录的整理以及已确认并有资料佐证的2000余所慰安所等相关内容。

李:“慰安妇”问题是日韩“和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参访资料馆的过程中也了解到来这边参观的韩国的团体比较多,这与韩国民间存在强烈的反对情绪有关。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很反复,那日本民意如何呢?

苏:我认为在90年代中期,日本的民意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当时,日本的各类教材普遍都有对真相的披露。但是自进入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时代以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安倍政府所任命的NHK社长,让NHK报道的导向发生了重大转变。所以现在如90年代初那样积极揭露日本战争暴行的团体和声音已变得极为稀少。以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为例,他在前几年不幸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并遭到日本右翼的起诉。尽管我们对他表示坚决支持,但遗憾的是,最终他仍败诉了,这一结果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透露自己也正在写人生的最后一部书。其实我有察觉到,与早年相比,他在某些观点上有所退步。早年间,他曾在书中估算“慰安妇”的数量可能达到20万。但是他现在认为这一数字应为5万,大幅后退了。我理解,但是我向他强调:我们在中国发现的资料越来越多。我于1999年提出的“慰安妇”总数至少在40万以上的观点,至今依然成立,甚至可能更多。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们仍在致力于将这段历史记录纳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就是要将日本的战争暴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如果日本不深刻反省,这一问题将永远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日本的民意,相较于之前无疑已倒退许多。

李:尹锡悦当选总统后,日韩关系不断升温了,这一迹象是不是说明“慰安妇”问题在日

韩之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会不会导致在这方面的研究比重会越来越低？

苏：关于尹锡悦体制对韩国政府与民间的影响，确实不能忽视。但是任何一个事件都不可能永远处在高潮，它肯定会有起伏波动，会有低潮有高潮，没有低潮也就没有高潮。尽管尹锡悦体制的影响广泛，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声音都被淹没了。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听到多元的声音的。前段时间我收到了韩国女性家族部的请求，他们计划在4月底至5月初期间派遣代表团前来参观。这其中包括一个专注于“慰安妇”问题的日军性奴隶研究所，他们将就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与我进行交流，尤其关注涉及朝鲜半岛“慰安妇”问题的部分。这一“慰安妇”研究所作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并没有被取消，还是有编制和资金支持的，这一事实也表明，在尹锡悦体制下，对于“慰安妇”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仍在继续进行，这就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李：谈到韩国“慰安妇”研究，我最近读到一本韩国学者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①一书，书中的部分观点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如她片面地强调“慰安妇”的主体性，是一种把女性主义高于民族国家主义的这样一种视角，您如何看待她的观点？

苏：我们过去开过两次会，对朴裕河的文章和观点进行了批评。其中一次是与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共同举办的，另一次则是以网络形式进行的。朴裕河的观点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的书在日本很受欢迎，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恐怕这也是唯一一位在战后将自己置于日本人立场的受害国女性学者了。她认为战争时期的日本和韩国是一个国家，这些“慰安妇”都是为了国家献身，简直是疯狂！我们遇到过数十位韩国受害者，她们都确认是受害者。朴的这个逻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荒谬至极，令人匪夷所思。女性主义是一种研究方法、一个研究视角，它的理论基础是坚实而科学的，并非空中楼阁。你们这一代人应该多写点英文文章，更广泛地向世界传递我们的声音和观点。原本，我是计划在即将出版的书中专门设置一个章节，对朴裕河的观点进行批判，但是陈老师不同意，她说我们这是在抬高她的地位，把她的谬论扔在综述中对她进行清算就可以了。

李：我国对“慰安妇”的研究已经精细到地区研究，但是随着幸存的受害者越来越少，您觉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未来的“慰安妇”研究还会有什么样突破性的进展吗？

苏：我认为研究“慰安妇”，与我们研究500年、1000年前的历史事件一样，都属于永恒的课题，永远会有人研究下去，因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当下的主要工作就是总结30多年来我们中国学界在“慰安妇”研究方面的观点与成果。这套书出版以后，我计划将调研过程中收集的各类资料，尤其是数万张珍贵的照片，无偿提供给北京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争数据平台，希望为未来研究提供有力证据。同时，我也在积极鼓励我的学生们，采用一些新的研究方

^① 《帝国的慰安妇》于2017年由玉山社出版，此书出版后便引起极大的争议。朴裕河认为：和日本人一样，朝鲜“慰安妇”是帮助日本军作战的爱国的存在，朝鲜“慰安妇”们对日本军，是具有同志的意识的。《帝国的慰安妇》使朴裕河在韩国被控告诽谤罪，一审判决无罪，2017年10月27日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判决诽谤罪成立；2023年10月26日，韩国大法院三审判决朴裕河罪名不成立。

法,比如说数字人文等。通过构建数据库,来发现一些新的内容。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发现新的史料,尽管此类资料已经不多了。

近年来,我们主要是购买一些日本方面的文物资料。比如资料馆内的一个女性雕像,它的保存者是一位姓田中的先生,田中的父亲早年就是上海海军俱乐部负责对“慰安妇”进行体检的医生。资料馆二楼的两个粉末状的安全套就是他父亲使用过的,这枚也是他父亲战争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安全套。我们还曾找到一本当年上海派遣军司令部1938年1月出版的写真集,其中就有南京慰安所的照片。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找到证据的。

随着时代变迁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我相信“慰安妇”这个话题将会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并有望在将来可以超越我们这一代,得出更加真实、更有价值、更科学的结论。

中心大事记

2024 年上半年

- 1月 16 日 日本熊本县蒲岛郁夫知事来访，并在中心作“梦想就在逆境中”的专题演讲，副校长陈志敏教授会见蒲岛知事一行。
- 1月 20 日 中心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广西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2023 年度中日经贸评估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 1月 26 日 复旦大学与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就“复旦大学·三井物产冠名讲座”项目签署捐赠及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山下直己、董事副总经理伊谷良太、企划业务部副部长山口健太郎、企划业务部部长助理黄云、复旦大学对外联络与发展处副处长陆颖丰、办公室主任薛刚、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交流办公室副科长朱一飞、日文系副主任刘佳琦、中心主任胡令远、副主任贺平出席签约仪式。
- 2月 2 日 胡令远应邀出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举办的第 9 届中日韩青年会和平论坛，并作题为《共挽和平之舟：百年变局下青年的使命、担当与路经》的主旨演讲。
- 2月 26 日 王广涛赴日本东京参加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举办的“次世代日本研究者协同研究工作坊”并担任讲师做有关日本研究相关的学术报告。
- 2月 27 日 中心举办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发布会，会上发布《中日关系 2023：再确认与再出发》战略报告，报告书各位执笔者就承担的内容进行汇报。
- 3月 9 日 中心与日本山梨学院大学在复旦大学联合主办学术交流会，胡令远、贺平、王广涛、姜茗予参加并分别致辞和发言。
- 3月 14 日 中心举办“国际日本研究”系列讲座第一讲，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舒曼副教授主讲，主题为“秩序转型中的次级大国：日本对于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追求（Second-Tier Great Power in Order Transition: Japan's Pursuit of 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in East Asia）”。

- 3月23日 中心与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2024”，主题为“以史为鉴，世界新变局下的中日关系”，贺平、姜茗予带领本校博士研究生参加。
- 4月1日 中心主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复旦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系特聘教授邵黎明主讲，主题为“中国医药产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4月7日 胡令远应邀出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与美国印太战略：比较、应对和前景”学术研讨会，作题为《亚太命运共同体与日本的印太战略》主题报告。
- 4月13日 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综合日本学中心副主任安达宏昭教授来访中心。
- 4月16日 贺平、王广涛赴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亚洲史前沿讲座第8讲，并担任与谈人。
- 4月19日 胡令远出席由中华日本学会、南昌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华日本学会2024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作大会《中日关系：再确认与新内涵》主题报告。
- 4月21-27日 王广涛带领学生赴日本调研，并访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众议院议员近藤昭一等多家机构，并在爱知大学举行学术发表会。
- 4月22日 中心主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上海海关学院万曙春教授主讲，主题为“海关法对新时期中国经贸发展的功能与作用”。
- 4月25日 中心与复旦大学周边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新时代我国的海洋经略：机遇与挑战”高端讲座，由潘新春先生主讲。
- 5月8日 王广涛应邀在上海大学作题为“区域与理论之间：日本国际关系研究刍议”的专题讲座。
- 5月11日 胡令远应邀出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成立大会暨区域国别研究高峰论坛”，当选为理事。
- 5月15日 王广涛应邀在杉达学院作题为“战后日本社会对美认知的演变”的专题讲座。
- 5月23日 中心主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系列讲座”，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艾菁老师主讲，主题为“新文科背景下大学日语专业的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 – 目标、路径、案例与思考”。
- 5月24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建校119周年暨第58届科研报告会”，主题

- 为“日本‘印太战略’的进展与台海局势”。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做主旨发言，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包霞琴教授，中心贺平、王广涛、姜茗予参加报告会。
- 5月26日 中心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联合主办题为“日本涉华话语建构”座谈会，上海市内外近2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 5月28日 一般财团东亚共同体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须川清司先生来访中心，中心贺平、王广涛、姜茗予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刘弘毅助理教授以及本院学生参加座谈。
- 5月31日 姜茗予在国际问题研究院校庆科研报告会作题为“移民对经济的影响与日本的选择性移民政策”的报告。
- 6月3日 胡令远应邀访问爱知大学，与该校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李春利所长、现代中国学部加治宏基教授就今后进一步加强交流，进行了座谈。
- 6月4-5日 胡令远应邀访问札幌大学，与荒川裕生理事长、大森義行校长就今后的合作进行了座谈交流，达成共识。与校友、中国驻札幌总领事王根华、教育领事金海燕进行了座谈与餐叙。
- 6月6-7日 胡令远访问长野大学。
- 6月10日 胡令远、贺平、王广涛访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与日本研究部原秀树部长、相关负责人盐泽雅代、西田融子、野口裕子进行座谈交流。
- 胡令远、贺平、王广涛访问上智大学，与中野晃一教授就中日关系等进行了交流。
- 胡令远、贺平、王广涛访问东芝国际交流财团，与网川智理事长、山崎裕纪专务理事、大森圭介理事进行交流，并讨论学术研讨会事宜。
- 胡令远、贺平、王广涛参加在早稻田大学召开的协商会议，就由中国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山梨学院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相关机构7校合作，设立东亚学术交流论坛事宜，达成共识。
- 6月11日 胡令远应邀访问日本共产党总部，绪方靖夫副委员长会见，并就访问复旦大学进行了交流协调。
- 胡令远、贺平、王广涛应邀访问山梨学院大学，共同举办题为“东亚政治与地区合作”学术研讨会，胡令远、今井久、贺平、王广涛、

- 斋藤雅代、高兰等双方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发表。
- 6月12日 贺平、王广涛应邀访问成蹊大学,商谈继续合作事宜。
- 6月17日 王广涛应邀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海上安全新形势”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的进展及对我影响”的报告。
- 6月19日 胡令远应邀为上海海关学院香港海关干部研修班作题为“中国国家安全总体形势及安全战略”学术讲座。
- 6月20日 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国际委员会负责人、原参议院议员绪方靖夫先生访问复旦大学,本中心举办题为“中日关系及东亚和平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绪方先生作基调报告,复旦大学以及上海市主要日本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会见绪方副委员长。
- 6月23日 中心与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联合举办“长三角东亚研究工作坊第29次例会”,广岛大学文学部殷晓星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吴佩遥出席并作报告。
胡令远主讲上海社科院日本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国际合作处联合举办的“逸思沙龙”第12期,讲题为“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其认知前提的逻辑关系”。
- 6月28日 上海市委外宣办事业发展处杨晶处长、四级调研员马洁以及澎湃新闻研究所创作部主编李魔来访,贺平、王广涛、姜茗予接待。
- 6月29日 王广涛赴日本东北大学短期访学两个月。

(王广涛)